

“四人帮”破坏工人运动罪行

资料摘编

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批判组

一九七八年三月

说 明

为了坚决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以“四人帮”的谬论为靶子，坚决推倒“工运黑线统治”论，彻底破除“四人帮”强加在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肃清流毒，把他们在工运战线上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我们编辑了这份资料摘编，供全总机关同志们参考。

资料的来源，大部分是公开报刊上的，少部分是内部文件、材料和资料上的，引用时请注意。

目 录

- 一、肆意践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
- 二、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3)
- 三、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
政治纲领…………… (8)
- 四、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炮制谬论，作为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
理论根据…………… (18)
- 五、反对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诬蔑“四个现代化”…… (19)
- 六、妄图用“企业三讲”取代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
——“鞍钢宪法”…………… (21)
- 七、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工业学大庆”的伟大革命群众运
动，反对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22)
- 八、禁止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35)
- 九、反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工矿企业走“五七”道路进行恶毒的
攻击…………… (37)
- 十、反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 (37)
- 十一、把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打成“黑样板”，为“两个估计”提供根据，
反对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38)
- 十二、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理论队伍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妄图要
工人理论队伍为他们篡党夺权摇旗呐喊…………… (41)
- 十三、颠倒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同工会的关系，妄图否定党、推翻
党、取代党…………… (44)
- 十四、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
人阶级…………… (47)
- 十五、炮制“工运黑线统治论，”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工运战
线的统治地位…………… (51)
- 十六、篡改工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妄图把工人阶级的工会变成“四人
帮”篡党夺权的帮会…………… (54)
- 十七、反对周总理提出的、毛主席党中央肯定的“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
工会组织领导原则，反对把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工会章程…………… (59)
- 十八、利用群众组织和工会阵地，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拼凑黑班底… (60)
- 十九、把工会“九大”筹备组变成“四人帮”同各省联系的联络点…………… (68)
- 二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阴谋建立工人“第二武装”，妄图策划反革命
武装暴乱…………… (72)

一、肆意践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人帮”有时直接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林彪一样，鼓吹“马列过时论”。江青不仅不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而且公然叫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适用了”。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因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人帮”有时又把马列主义的某些方面夸大到荒谬的地步，歪曲为僵死的东西，也同林彪一样贩卖“顶峰论”。这又是十足的教条主义。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8日《“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

“四人帮”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较之胡风犹有过之。江青把毛主席对她的告诫诬蔑为“紧箍咒”，咬牙切齿地说：“他一念紧箍咒，我就头痛。”张春桥竟然宣称：“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让人家看，看了要使他们学会分析。”“四人帮”的亲信更是凶相毕露，狂喊乱叫：“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要抓辫子还不容易？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这是关起门来讲的。”妙极了，“关起门来讲”，活画出这个反革命黑帮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张春桥公然反对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胡说“这些东西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都看，不可能，也不需要。”

《光明日报》1977年1月7日《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缅怀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

张春桥说：“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列宁的说法是不够的”，毛主席著作“也不是句句精彩”。到了一九七五年春季，他甚至向一个心腹透露，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光明日报》1977年3月16日《捣乱和失败的纪录》

江青胡说毛主席只是对“农村包围城市和工商业的赎买政策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她打着解释毛主席一封信的幌子，恶毒污蔑毛主席“搞点折中主义还得和点稀泥”。

《广州日报》1977年1月13日《江青篡党夺权的一次丑恶表演》

张春桥说：“现在出毛选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上海的余党攻击说：“出版五卷是适应右的需要”。

上海市委负责同志1977年3月揭发

毛主席刚去世，张春桥就对他的亲信说：“《毛选》五卷不能出了，只能出单篇。”为什么不出选集只能出单篇呢？这个亲信作了很好的注脚：“这可厉害了，要怎么出就怎么出，要整谁就整谁！”原来，他们是想把毛主席著作垄断起来，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什么时候发表，一切服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张春桥说：“《论十大关系》完全是苏联的一套，无非是企业管理，物质刺激”。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王知常交待

那个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就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阶级斗争不抓也灵”。

《文汇报》1976年11月19日《一个篡党夺权的政治纲领》

“四人帮”大肆鼓吹“方针”决定一切，这就是直接否定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开背叛和无耻修正。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4日《一个加紧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江青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这段光辉论述的呢？她说，阶级敌人非跳出来不可，那是因为“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五·一六分子，很多是青年人”，“有一部分难改”七八年来一次，则是因为“十次斗争，五十年，平均五年一次”云云，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广州日报》1976年12月14日《为篡党夺权的一次丑恶表演》

“四人帮”同胡风一鼻孔出气。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说：“写文章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要引证就要去找，就得学习”。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原来张春桥之流读马列的书，就是为了寻章摘句，装点门面，以便抓大旗作虎皮，去判定那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是搞“经验主义”、“折中主义”等等。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政治经济学有一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男的、女的，还不都是女的生的？

《候隽揭发《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

张春桥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竟被吹嘘为“第一次明确地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一个明确地阐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他们否定毛主席和华主席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问题的论述，胡说不管什么样经济条件都可以过渡，也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也可以过渡，并且迫不及待地要出一本所谓像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样的书，要“写序言，加按语”，要“站得高，口气大，有点哲理，居高临下”。甚至狗胆包天地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得晚了，等到出来，高潮已经过去了，这次要抓得早，要写在高潮到来之前”。这些谬论是他们所谓的“张春桥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居然被吹捧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第四个里程碑”，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以上海为阵地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上海市革委会付主任、王一平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张春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是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新变化”、“两级所有制”三个方面组成。

上海师大政教系揭发，见1976年《文汇情况》（728）

王一次窜到上海某工厂进行所谓“视察”时，胡说什么“手表这种东西”“如果（多得）放在马路上的话，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广西日报》1976年11月28日《王洪文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二、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王洪文1976年10月3日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她（江青）经常恬不知耻地胡诌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造反派头头就听我的话！”她吹嘘“文化大革命中我废寝忘食地工作把身体搞垮啦”。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26日《革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师，所以他首先打我。

江青1976年3月2日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纪录稿

今年九月五日，她上了虎头山，在大寨公社牧场的小房内休息，大寨公社宣传队准备为她演出文艺节目，先奏《东方红》乐曲，她说：“你们奏《东方红》我就不出去，很快给我停下来。”

王金籽同志1976年10月21日：《江青两次来大寨干了些什么？》

江青到大寨，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拚命为自己树碑立传，硬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她每到一处，总要先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有一次，她还吹嘘说：“我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有什么事，都得通过我。下边有什么事，也都得先告我，这么多年了，我协助主席工作。”

《山西日报》1976年11月8日《虎头山上山下战鼓震天 深揭深批反党集团》

一九七五年九月反党分子江青窜到大寨，借评《水浒》之名，别有用心地说：“我明确地告诉你们，《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山西日报》1976年11月8日《大寨贫下中农满腔仇恨 同讨共伐四大恶霸》

（江青）公然编造谎言，分裂中央，叫喊什么“现在中央有人就是要架空毛主席。”

《山西日报》1976年10月26日《砸烂“四人帮” 拔掉大祸根》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

江青1976年3月2日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纪录稿

大工贼王洪文为了贬低和反对毛主席，简直象一条疯狗一样，到处狺狺乱吠，甚至到苗圃参观时，也不放过攻击的机会。毛主席指示，园林工作要贯彻园林结合生产的方针，做到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并指出，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王洪文到共青、

龙华两个苗圃参观花卉、盆景时，竟同毛主席大唱反调，冷冷地说：“有人讲种花会变修，我看不见得。你们种了很多花，不是没有修嘛？”“种点花就会变修正主义？我不相信。我这个人喜欢唱反调的。”

《解放军日报》1977年3月19日《暗中磨剑，窥测方向——揭批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际王洪文上海之行的累累罪行》

“工农是要革命的。马克思死后出了列宁，列宁当时是个小人物，普列哈诺夫是个大人物。我党初期，陈独秀是个大人物，毛主席是个小人物。马克思死前讲，我死后总会有人出来革命，后来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出来了。”张春桥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原意，以示其是个小人物，毛主席逝世后应由他来掌大权。充分暴露了张春桥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十七）1976年12月3日

毛主席对“四人帮”的许多尖锐批判，更使心怀鬼胎的张春桥惶惶不可终日，他曾供认“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会掉脑袋！”

《人民日报》1977年5月5日《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一九七五年一月，江青窜到饭店，疯狂地说：“不怕人家说我们搞小集团”，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5日《“四人帮”是祸国殃民复辟倒退投降卖国帮》

“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遭到毛主席批判后，姚文元一肚子不满，曾嘟嘟囔囔地说这仅仅是一个提法问题，问题就那么大嘛！”

《北京日报》1977年3月4日《“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

大工贼王洪文则以“工人运动领袖”、“司令”自居，指使亲信把他住过、工作过的地方作为“革命圣地”，叫人“瞻仰”，还把他的所谓“视察讲话”印成小册子，作为工会干部的“必读材料”。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他狂妄地把自己同毛主席相提并论，窜到江南造船厂时，要人陪他沿着当年毛主席视察时经过的路线走一遍；窜到“风庆轮”上时，让余党肉麻地吹捧为与毛主席视察“长江舰”

一样重要。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9日《暗中磨剑，窥测方向——揭批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际王洪文上海之行的累累罪行》

他要自己去过的单位把他的所谓“视察”作为“特大喜讯”传达到每个群众，并且对他的黑指示要逐条讨论，逐句落实，时时对照。甚至一年以后，还要这些单位搞所谓“视察一周年纪念”活动，向他“献忠心”、“表决心”，真是狂妄和无耻到了极点！

(同上)

去年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万分悲痛，张春桥及其“四人帮”同伙却欣喜若狂。对总理的职务，他早就垂涎三尺，此时更加眼红。他们的亲信爪牙公然贴出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向毛主席，党中央示威。就在张春桥大作“当总理”的美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英明决策，把总理这一重任交给他老人家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给了张春桥当头一棒。这个反动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他的《有感》，发泄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咒骂华主席，发誓要把“新桃换旧符”。

《人民日报》1977年5月5日《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去年九月，反党分子江青窜来大寨，有一次在饭厅里气势汹汹地说，毛主席批评她是有人造谣，甚至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她的谣。说什么：“我吃得又多，吃得又好，我才不怕他们造谣哪。”又说：“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针对林彪给我写的信，你们听到过没有？毛主席从来是相信我这个人的，怎么能够批评我呀！”

《山西日报》1976年11月8日《大寨贫下中农满腔仇恨 同讨共伐四大恶霸》

今年十月三日和五日，江青窜到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就以毛主席的代表自诩，进行招摇撞骗，她不知羞耻地说什么：“你们相信我，是信任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就参加了。除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我是主席的哨兵。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

假借“毛选”出版问题，恶毒攻击华主席，煽动群众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别有用心地说：“在出版‘毛选’问题上，‘群众意见大了，连外国人都有意见。这不光是忙，也有斗争。”并煽动说：“你们写信给中央嘛，给华国锋总理，要求出‘毛选’，引起重视。这样的信不少，有的不只是一个厂，有的是省。你不出全集，出选集也可以”，“我们在中央，我们就喊”。

江青还含沙射影地说：现在“有的人只能演红娘，不能演老夫人”。并杀气腾腾地叫嚷：“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她所谓“红娘”、“老夫人”，就是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只能当主角，不能当配角，仇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华主席没有把权交给她；她所谓“不怕杀头、坐牢”，就是妄图推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9日《狠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今年九月，江青二到大寨，在有一次吃饭时说：“外国人说的，中国党内有温和派，激进派、左派，说我江青是左派领袖。”

《山西日报》1976年11月8日《大寨贫下中农满腔仇恨 同讨共伐四大恶霸》

江青四处游说，大肆叫嚷：“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妇女也可以当总理”，文艺创作要多写“女主角”。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在群众中肆无忌惮地叫嚷：“氏族社会是女人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甚至露骨地叫喊：“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3日《江青关心妇女地位提高是假阴谋篡党夺权是真》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曾经对华国锋同志讲过刘邦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

江青为了效法吕后，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女皇”，从六月到十月，活象个热锅上的蚂蚁，走天津，窜大寨，跑北京，又是接见，又是参观，又是开会，又是抓点，接二连三地鼓吹：“吕后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尚太后了不起”；“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西太后“名曰太后，实际是女皇”；武则天当皇帝“大得人心”。

甚至在外宾面前，她也不知羞耻地吹嘘“我是当然的接班人”。

一次会上，有人说发现了吕后的玉玺，她惊喜若狂：“是真的？在那里？快拿来看！这很重要！”

一个亲信给她仿制了一套武则天的龙衣，赢得她格外的欢心。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6日《江青的女皇梦与吕后的篡权术》

一九七四年夏，“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带着一帮随从跑到山东渤海海滨，摄了一幅黑照片，题名《琅琊台》，并自配黑诗，曰：“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而露峥嵘”。……这首黑诗暴露了江青的反革命心志，她“登基”心切，溢于言表。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20日《从〈琅琊台〉看江青的皇帝梦》

叛徒江青更是以党的化身自居，恬不知耻地说什么“老娘”就是党。

《新华日报》1977年12月8日《抓纲治党——热烈祝贺中共江苏省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新华日报》、《工农兵评论》社论

三、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卑鄙。”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就提出一个反动理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他妄图通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其“改朝换代”的野心。他把“打倒一切”的矛头，首先指向一切久经考验、对党无比忠诚的好干部。他用蒋介石的语言攻击污蔑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攻击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干部“不是好东西”，“是一批老右派”，公开煽动“要象打仗一样”去“战胜”他们。这完全是国民党“还乡团”复仇、变天心理的真实写照！

《人民日报》1977年5月5日《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同林彪一伙，诬蔑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家机构是“旧政府”，别有用心地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说成什么“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发出了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狂吠。

《人民日报》1977年1月7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激起天怨人怒》

他们拣起林彪的“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破烂货，先把老干部打成“民主派”，又把“民主派”统统打成“走资派”，于是，就抛出了以打倒老干部、篡权复辟为中心内容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大众日报》1977年11月11日《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纲领——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四人帮”打着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幌子，诬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是“走资派”，别有用心地提出“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叫嚣“这是专政工作的新课题”。

《人民日报》1977年1月3日《绝不容许倒转无产阶级专政矛头》

一九七四年一月，江青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国务院万人大会上大反“走后门”，对周总理搞突然袭击，妄图打倒周总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大放厥词，贬低、攻击周总理，肆意捏造历史，含沙射影叫嚷要揪出“现代的大儒”；江青采取了种种恶劣手法，折磨迫害已经积劳成疾的周总理，……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还力图抹掉周总理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5日《江青大谈“清君侧”意在篡党夺权》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一不批林，二不批孔，专揪所谓“党内最大的儒”。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授意炮制的《推倒大山，阔步前进》的反党文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鼓吹到处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到处抓“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胡说什么这是所谓“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反潮流”；而其目的则是乘四届人大召开之际，野心勃勃地要组织他们的“内阁”。

《四川日报》1977年2月1日《“四人帮”反的是什么潮流？》

杭丝联的同志愤怒揭发说，王洪文这个大坏蛋，有一次窜到他们厂开新老干部座谈会，大放厥词，说什么当前主要矛盾“是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

《浙江日报》1976年11月28日

《紧跟华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大打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人民战争》

翁森鹤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法家和儒家的矛盾”，“革新力量和复辟势力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浙江同志揭发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张春桥说：“我国现在正处在新旧两代人交替时期”。并与上海的余党交底：“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应把‘换’字改成‘撵’字，旧人不走，就要撵。”

上海市委负责同志1977年3月揭发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毛主席在一九七六年又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蓄意歪曲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把毛主席所说的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成是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且说：“这个资产阶级是由占老干部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所谓民主派组成的，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一个规律。”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他们胡说什么“走资派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鼓吹只要“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正确。

《四川日报》1976年12月10日《让大寨红花开遍巴山蜀水——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期间，抓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同走资派斗争，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要害。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6年6月5日在全总机关第四期学习班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三月，反党分子王洪文向他的一个心腹面授机宜说：“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是明牌货，不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杀几个人，放几把火，算不了什么！”

《人民日报》1977年1月3日《绝不允许倒转无产阶级专政矛头》

现在两大阶级的主要战场在共产党内，因为党内资产阶级危害性大，手中有权。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6年6月5日在全总机关第四期学习班上的讲话

多年来，“四人帮”大搞“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反“经验主义”，极力歪曲毛主席对《水浒传》的批示，以及他们搞的“写走资派”的阴谋文艺，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所谓“只有一个斗走资派专业”的教育等等，其源皆出于他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纲领。

《大众日报》1977年11月11日《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纲领——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在“四人帮”眼中，老干部既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对象，又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因此，他们始终把攻击的主要锋芒针对着党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伙同林彪搞“打倒一切”，以后变本加厉，又搞什么“三箭齐发”、“抓党内大儒”、“反经验主义”、“打资产阶级土围子”等等，无不如此，直到公开抛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使这种诬陷和迫害革命老干部的罪恶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5日《一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旗——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

二月二十五日（按：一九七六年），经毛主席批准，华国锋同志对运动作了重要部署。为了对抗中央的部署，江青第二天就窜到清华，煽动要揪“一层人”。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9日《反革命野心家——迟群》

“四人帮”一再叫嚣：“走资派还在走，是一层人”，“要解决一层人的问题”。什么叫做“一层人”呢？反革命文痞姚文元作了一个明确的说明。他说：“关于一层人的问题，可以讲；但见文字还是要提一个阶级。”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说得更加露骨：“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认为，这里讲的资产阶级指的是阶级的整体”。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他们不仅提出要揪“一层人”，而叫嚷“一级盯一级”，“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特别要盯住第一把手”。矛头对着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人民日报》1977年1月30日《从清华北大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要“眼睛盯”党委，心要想着党委，手要指着党委。”

王景升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对抚顺市工会干部的讲话

“四人帮”一伙叫嚷什么……“他们不穿国民党的服装，开会坐在主席台上，其实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你明明知道是，还不能动他们，事情就是这么复杂”。

《黑龙江日报》1976年11月17日《货真价实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

经过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张春桥一伙对我们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的诬蔑和诋毁不仅没有收敛一些，反而更加猖狂。他们叫嚣什么“中央和国务院有一批官僚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办资产阶级”。他们恶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叫嚣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军内资产阶级”。他们甚至公开叫嚣现在中国是“豺狼当道”，是“党内资产阶级掌权”，“现在全国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网，把持着社会主义经济，成了走资派所有制”，叫嚣要“把左派组织起来，打倒右派”，要进行什么“第二次革命”。

《人民日报》1977年5月26日《张春桥为什么要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

张春桥胡说什么大部分老干部“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在对立面”，成为“比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

《大众日报》1977年11月11日《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纲领——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大野心家江青胡说什么“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这是一般客观规律”。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9日《“三要三不要”是识别党内走资派的照妖镜》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还大肆宣扬，“党内资产阶级”是由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老

干部变成的，说什么“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呀，“历史的辩证法”呀，不一而足。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姚文元狂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干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打倒”，……

《湖北日报》1976年12月3日《究竟是谁家的“代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王洪文（一九七三年底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中央读书班作了一个黑“报告”）胡说“有些省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有些地方闹”，“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湖南日报》1977年2月20日《一份篡党夺权的挑战书》

“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以个人谈体会的方式，传达了江青、张春桥的黑指示，……“走资派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过去只是党的同路人，社会主义时期就是革命对象。”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3日《“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

他们赤裸裸地叫嚷：“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辛辛苦苦抓生产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牌子很硬的走资派。”

《大众日报》1977年11月11日《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纲领——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就公开叫喊，斗争的重点“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二把手”。

《解放军报》1976年12月26日《不许篡改走资派的阶级内容》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别有用心地抬高青年干部，挑拨新老干部不和，挑动青年干部斗老干部。……还出现了这样的奇谈怪论：“新干部就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老干部就是旧生产关系的代表”。

《辽宁日报》1976年12月19日《炮制“哈尔套经验”的险恶用心》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黑干将，去年三月下旬，在和太原铁路局一个反革命分子

密谋破坏铁路运输时，就赤裸裸地亮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计划：

“要通过批邓夺权。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

“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第三步，在建立新政权之后，再抓生产建设。”

请看，“四人帮”的野心有多大！他们的反革命策略何等阴险毒辣！这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自供状，也是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9日《篡党夺权的自供状——剖析“四人帮”一伙抛出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夺权计划》

为了推行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炮制了一个“走资派所有制”的反动理论。他们胡说什么“全国上下左右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网，把持了社会经济，成了走资派所有制”，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已经变成了“党内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真荒谬至极，反动透顶。

《湖北日报》1977年11月11日《斥所谓“走资派所有制”》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叫嚣说，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干部“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此外，他们还蓄意把级别高、工资高当成划分“走资派”的经济标准，叫嚷什么“工资一、二百元以上的”、“坐小汽车”、“有服务员”的“大官”就是“走资派”。

《大众日报》1977年11月11日《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纲领——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他们还提出了走资派的生理标志，胡说走资派必然“头上一片霜，眼前一片光”。猖狂叫嚷要揪什么“老花眼、大肚皮、白头发、高血压，心脏病的走资派”。真是荒谬至极，反动透顶！

“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所作的歪曲，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敌我关系。他们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决不是指党内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硬把这顶帽子扣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大部分老干部头上。他们说得非常清楚：“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

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要“揪出一层人”。这一层人中甚至包括了象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样卓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他们要打倒的，并不限于老干部。新干部只要不跟着他们走，也都给戴上投降派的帽子，一概打倒。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打倒一批人，而且是要通过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抹黑，来摧毁我们的党。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笔下的民主派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偷梁换柱，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当时社会上民主主义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描述，用来形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干部，说这些干部是：“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84页）；永远都是向后看的，他们竭力把事情安排得能够使他们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列宁：《政治鼓励和“阶级观点”》《列宁全集》第5卷，第309页）。“四人帮”的理论家们明明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西欧十九世纪的旧民主主义者，列宁讲的是俄国二十世纪初的旧民主主义者。这种西欧和俄国的旧民主主义者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干部，所处的革命历史条件截然不同，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他们却把这种旧民主主义者的帽子强加在我们党的大部分干部头上。“四人帮”还说这样的民主派“满足于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热中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4日《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批判“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的严重歪曲》

他们为了推行反革命的政治纲领，耍尽阴谋诡计，制造纠纷，挑动武斗，丧心病狂地煽动“打死人才好，可以把问题搞到‘走资派’头上”。他们拼命破坏生产，声称“搞垮一个厂子，就在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上一条绞索。”他们是那样咬牙切齿，磨拳擦掌，恨不得把全体革命老干部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同“四人帮”的愿望完全相反，他们反对革命老干部的活动越是疯狂，越是提高了革命老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打击、诬陷、迫害邓副主席的结果正是这样。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诽谤、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好证明。”（《列宁全集》第25卷第249页）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5日《一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旗——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

他们以反映无产阶级与走资派作斗争为名，大肆鼓吹文艺要写“走资派”，演“走资

派”，画“走资派”，搅混了敌我界限。……今年三月在文化部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四人帮”授意他们的亲信，疯狂地叫喊“要写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部”的走资派，面要广一些”，从生产大队一直写到中央。……要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写同“走资派”的斗争，胡说什么除了毛主席外，那一级的领导都可以写成走资派，公然与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指示唱对台戏。

《黑龙江日报》1976年11月22日《“四人帮”是破坏
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

去年年初，“四人帮”说：“山西一潭死水，冷冷清清，要促进一下。”迟群策划于密室，向太原铁路局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说：“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老干部“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打跑，打不跑的打病、打伤。”与此同时，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伙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调来了一门“大炮”，这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他去山西摇唇鼓舌，煽风点火，杀气腾腾地叫嚣要以“铁的手腕“对老干部”动大手术”，“彻底改组”各级领导。一时间，太原城里一片乌烟瘴气，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铁路堵塞，公共汽车停驶，连省委书记也遭到暴徒殴打。当时，全国各地被这伙反革命搞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厂无宁日，校无宁日。消息传来，迟群少不得说一句“停下来了，这是正常的”。江青则欣喜若狂，说什么“走资派为什么不可以打！”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9日《反革命野心家——迟
群》

“四人帮”在山西鼓吹什么对省委、地委、县委的问题，“揭不开就捅开，捅不开就砸开，砸不开就炸开”；叫嚷什么调整充实干部就是刮右倾翻案风；“刮出去的要刮回来，刮进来的要刮出去，刮下来的要刮上去”，什么“老干部百分之七、八十是民主革命派，走资派是民主革命派的变种”，要“同他们血战到底”，统统打倒。

《山西日报》1976年11月13日《彻底揭发批判“四人
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

斗争的形式有各式各样，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可能会出现这种形式，也会出现那种形式，同志们要善于识别，……我们总终究会取得胜利，但要经过斗争。啊！不管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今后再出现什么人也好，我们要善于识别，要斗争。

王洪文1975年9月8日在上海市总工会五届八次全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接过反对走资派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的完整论述，肆意地把一小撮夸大为一大片，把极少数夸大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叫嚣什么走资派”上面有，下面有，遍地皆是，到处都走”，“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走资派”。

《大众日报》1977年11月11日《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领
导——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到了毛主席病重期间，一九七六年七月，“四人帮”由王洪文出面，提出了一个全面篡夺党政军大权的计划。王洪文说：“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干的这一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全面赶下台，让资产阶级全面登台，实际上，“四人帮”早就已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准备了许多“部长”、“司局长”以及驻外“大使”，就等一声令下，走马上任了。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四人帮”为了给他们发明的老干部发展到“走资派”的“规律”制造理论根据，别有用心地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大做文章。其实，他们有什么资格谈论民主革命？“四人帮”之中有三人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他们的家庭又都是地主，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叫嚷要打倒什么“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要打倒什么“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疯狂叫嚣“阶级的仇一定要报！”还是喊出了被我们党打倒的反动阶级郁积多年的心里话，象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他们不但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5日《一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旗帜——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

他们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还把攻击矛头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去年上半年，“五虎将”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私整和印发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有四十三种之多，被点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达五十二人，其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付总理十二人，人大常委会付委员长三人，国务院部委负责同志二十余人，还有十三个省的省委书记。那个把持上海市轻工系统领导大权的“虎将”，指名道姓恶毒攻击了国务院六位付总理，还利用职权，强令开动印刷机，印发了五十万份整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解放日报》1977年4月2日《“五虎将”是怎样混进党内的——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可是，王洪文认为时机到了，他竟敢切断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说有事要向他报告。在王洪文看来，权夺定了。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已在疯狂准备反革命政变，迫不及待地炮制“杀人”的计划，要“枪毙”“走资派”，并且提出要制定有关的反革命的“法律”。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5日《一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旗——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

在“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他们搞帮统治，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那是绝对不准乱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乱了我们自己”，“甚为顾虑”。谁要反对他们，就给谁加上“攻击中央首长”，“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实行残酷的镇压。张春桥不是在他的反动提纲中赫然写下“杀人”二字吗？这充分暴露出他这个从历史到现行的法西斯分子的狰狞面目。在这里，孔孟儒家反对“犯上作乱”，又成为“四人帮”的神圣信条了。

《红旗》1977年第四期《“批判”还是奉行？》

唐岐山说：“对走资派”“要一批、二斗、三枪毙。”

1976年工业学大庆座谈会揭发

今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江青忽然带着她的心腹窜到北京卫戍区某部“大功四连”，别有用心地说：“主席逝世了，都想捞一把”，“没有暴露的走资派还有没有？有！他们不甘罢休。”恶毒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6日《痛打落水狗大揭大批“四人帮”极右路线》

毛主席逝世后，江青急于“临朝称制”，在清华园里胡说：“死去的算了，主要是活着的人”，要大家“迎接重大政治事件”。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9日《反革命野心家——迟群》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是奇怪的。

王洪文1976年10月3日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去年下半年王洪文专门派人将他们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送到上棉十七厂，别有用心地再三要求上棉十七厂党委关起门来议，议的深一点，想的远一点，并说十七棉可以大干了。

《文汇报》1976年11月15日《愤怒声讨王洪文为自己树碑立传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

毛主席逝世后的一个月，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白刃相见的时刻。在这不寻常的时刻，江青六天之内，五次去清华。她从挎包里拔出锃亮的剪刀“宣誓”，要和华国锋为首的

党中央决斗。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9日《反革命野心家——迟群》

四、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炮制谬论，作为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根据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迫不及待地连续抛出两篇反党文章，抓住资产阶级权利（原译为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题目，喧嚣叫嚷，篡改歪曲，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搞得面目皆非，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他们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炮制的谬论，是他们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作为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根据而提出来的。

《光明日报》1977年11月14日《学习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权利的分析——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制造了无穷的混乱。反动文痞姚文元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胡说：“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接着，“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所炮制的其他一系列文章，就都以这个说法为口径，纷纷出笼，大叫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等等。

《光明日报》1977年6月13日《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吗？——斥姚文元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

“四人帮”为了篡权，把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法权，说得漆里一团，臭不可闻，甚至宣布这个法权现在已经“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这不是把资产阶级法权一棍子打死么？这不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鼓吹的“彻底破除”么？

《光明日报》1977年6月13日《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吗？——斥姚文元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

王洪文竟不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胡说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也实行按劳分配。这就暴露了“四人帮”一伙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资制度、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科学分析及其结论，充分说明他们是一批以假象为根据，为资本的自由剥削进行辩护的反动家伙。

（同上）

新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胡说过：“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2日《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

“四人帮”为了搞垮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公然否定我国国营企业工资的社会主义性质。王洪文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从内容上看，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主义也有。”“四人帮”通过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理论”的形式复述王洪文的荒谬论断，写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范畴及其具体形式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工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旧范畴！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5日《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驳斥“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工资的污蔑》

张春桥断言：“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他们还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物质条件的关系上说什么“现在物质条件比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不知好多少倍，难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条件还不具备吗？”他们还把注意解决职工实际困难，说成是“物质刺激”、“经济主义”，归之为必须加以限制的法权一类。还说什么民主派“必然要变为走资派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甘肃日报》1977年3月4日《彻底批判“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谬论》

五、反对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污蔑“四个现代化”

张春桥在选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语录时，把“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一句删掉了。

《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大冶冶金企业》

姚文元在侈谈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也闭口不谈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九七五年，冶金部写作小组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在为《红旗》写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加强国防，加速农业机械化，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物质基础都离不开钢铁”。姚文元看了，火冒三丈，一刀把它砍掉。

（同上）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胡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否定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是“搞资本主义化”。

《人民日报》1977年1月24日《四个现代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一九七五年春，四届人大刚刚重申了毛主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宏伟设想，张春桥就跳出来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无非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影射攻击四个现代化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民日报》1977年7月16日《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姚文元说的更露骨。被他们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总纲》中说，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姚文元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

（同上）

“四人帮”一伙竭力诬蔑农业机械化、搞四个现代化是什么“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物质基础”，别有用心地散布“四个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反动谬论。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1日《打倒“四人帮”农业机械化有希望》

12. 仙山琼阁的蓝图——“一切为了现代化”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6年3月12日写的一份“批判提纲”

主唱奴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竟然狂叫“什么现代化，真是法西斯化”。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甚至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其源盖出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这不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号召，又是什么呢？

《人民日报》1977年7月16日《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今年九月，反党分子江青在大寨明目张胆地造谣说：“毛主席就没有讲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是有人加上的。”

《山西日报》1977年11月8日《破坏抓革命反对促生产》

他们污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修正主义的口号”，……

《人民日报》1977年7月16日《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当时刘少奇势力确实不小，有他们的基础。所以说，有相当大的工厂里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群众手里。至于学校恐怕一个也没有。

张春桥1970年12月22日在部队小组的一次讲话

“四人帮”对待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看法，同孔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张春桥宣称：“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物质，我就不管了。”他们宣称不要物质，不要生产，不要经济，在精神与物质，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光明日报》1977年4月14日《“四人帮”与孔孟之道》

六、妄图用“企业三讲”取代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鞍钢宪法”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一系列光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且亲自制定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鞍钢宪法”，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指明了方向。不学无术的王洪文对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指示十分仇视，百般诋毁。有次他曾窜到上棉十七厂，无耻地吹嘘说：“最近我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回顾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总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要好好摸索。”事后在一次接见中，当这家厂向他汇报准备掀起学习“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打算时，他很不耐烦地说：“这个东西（指‘鞍钢宪法’）放到学校里去学吧！”第二天，他窜到上钢五厂，又喋喋不休地大谈“企业管理问题”，把光辉的“鞍钢宪法”搁在一边，要五厂“在炼钢厂的企业管上搞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来”。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9日《暗中磨剑，窥则方向》

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姚文元提出，“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相互关系”，妄想用所谓“企业三讲”来取消“鞍钢宪法”。

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揭发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消灭阶级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毛主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四人帮”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玩弄形而上学的诡辩术，胡说什么“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互相关系”，就是不讲发展生产力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大冶冶金企业》

毛主席明确肯定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了，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攻击道：“谈所有制问题”要“清醒”，“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是“不对的”。什么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所有制问题呢？张春桥说“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这样，张春桥又打出一发炮弹：要谈论所有制的变更，首先必须分析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人民日报》1977年5月26日《张春桥为什么要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

一九七四年底，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张春桥写了一篇文章，自称要帮助读者“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有一段是这样：“**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张春桥抓住毛主席这段指示的最后一句，大讲我国的所有制问题。讲什么？是讲旧中国的各种私有制怎样改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吗？不是。张春桥的意图非常露骨。他大讲所有制问题，是妄图把毛主席的科学论断推翻。用他们的“帮话”来讲，就是“对着干”。毛主席说，同解放前相比，我国的“**所有制变更了**”。张春桥在文章中公然说，不，我国“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同上）

七、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工业学大庆”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反对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就对大庆展开反革命围剿。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重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英明决策，他们就一手制造了“砸烂大庆展览”的反革命事件，并连续十七次派出所谓“战斗队”、“调查组”，如狼似虎地扑向大庆。他们诬蔑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党委是“黑”的，叫嚣要“彻底批判大庆道路”。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他们把领导大庆会战的主要负责同志打成什么“黑干将”，把铁人王进喜打成“全国头号政治大扒手”，把油田的

几千名先进模范人物打成“黑标兵”，甚至把班组长的权也夺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周总理视察过的先进单位，接见过的标兵人物，他们统统冲击，统统揪斗。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5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几个家伙到一二〇二钻井队，狂叫道：“你们那六十多面锦旗挂在墙上，是给修正主义树碑立传，为走资派涂脂抹粉，干脆扯下来，一把火烧掉”，吵嚷：“你们去年打的十万米就是假的，人家外国都打不出十万米，你们是吹牛！”

《人民日报》1977年3月29日《“钢铁钻井”吴全清》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反党集团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庆也有那么几个人，竭力反对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创造的大庆，妄图用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造”大庆。他们恶毒攻击大庆两论起家基本功，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胡说什么两论“只改造主观世界，不改造客观世界；”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庆石油会战，胡说什么大会战是“劳民伤财”，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诬蔑大庆红旗“先红后黑”；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攻击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倡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是搞“假共产主义”；疯狂反对大庆的管理经验，诬蔑三老四严是“奴隶主义”；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等等。周总理视察过的“严细成风”的中四采油队，三面锦旗被说成是“黑”的，三名标兵被打成“假”的，三员虎将被诬蔑为“生产典型”、结果这个队硬是被整垮，变成了后进队。他们利用职权，大搞资本主义，公然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里提倡私人开荒种地、私人养猪，甚至把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勾结，大量盗窃国家的原油、钢材，换肉换菜等，称之为“加强工农联盟”、“关心职工生活”。职工队伍受到腐蚀，集体农付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一半。他们搞清队扩大化，反“右倾”，大搞所谓的漏网走资派，对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罗织罪名，刑讯逼供，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经过查核，全部是冤案。他们还胡说什么“三年不搞科研，油田照样出油”，致使油田地下注水量减少，压力下降，严重影响了老油田的产量。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坚持斗争，“把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5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人帮”就把黑手直接插到大庆，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进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放虎归山”，指使张洪池窜回大庆，伙同当时大庆领导班子里支持他们捣乱的个别人，上下串连，拉帮结伙，妄图全面搞乱大庆，夺取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张洪池象个“地老鼠”，一回到大庆，就按照王洪文一次黑讲话的旨意，炮制出一封公开信，提出了篡权复辟的黑纲领。他们攻击周总理关于“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的批示是大庆“右倾复辟回潮的总根子”；他们诬蔑大庆搞的是“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他们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点名揪斗各级领导干部，

并且要在各级党委班子里，塞进“三分之一的少正卯式人物”来掌权；他们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法家造反，儒家生产”等等反动观点，妄图搞垮大庆。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5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一九七五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号召我们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国务院积极准备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各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四人帮”却百般阻挠和破坏会议的召开。张春桥猖狂叫嚣“现在学大庆，不得要领”，甚至告诉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不管他们那一套。”“四人帮”公然把大庆列为“禁区”，不准上海的同志到大庆参观，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上海职工到大庆学习，他们竟然要事先“打预防针”，事后“消毒”。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
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四人帮”还通过反对电影《创业》来反大庆，砍红旗，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江青恶毒地攻击《创业》是为修正主义“树碑立传”，给它横加了十条莫须有的“罪名”。姚文元公然污蔑《创业》是“给刘少奇涂脂抹粉的”。他们勒令影片在全国停演，甚至狂妄地叫喊要追查“黑后台”，其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毛主席及时作了光辉批示，戳穿了“四人帮”的阴谋，给了大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但是，“四人帮”并没有罢休，继续迫害《创业》的作者，对抗毛主席的批示，顽固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四人帮”要把《创业》打下十八层地狱，还把周总理指示摄制的《大庆战歌》扣压了十年之久，打入冷宫，同时却把一部描写西方资产阶级勘探石油、发家致富的外国影片捧上了天，说它比我们的《创业》还好，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这伙洋奴、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正如毛主席批判他们的时候所指出的，在他们眼里月亮也是外国的好。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
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王洪文叫嚷：“大庆是一个点，上海是一个面”，“我们要总结上海一套完整经验”。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付主任
王一平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张春桥在一九七四年十月竟露骨地说什么：“大庆是管、卡、压的典型，是唯生产力论的样板”。“毛主席过去树他们，是创业阶段，现在他们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批条条专政，批唯生产力论。”

《黑龙江日报》1976年11月23日《红心向着华主席
彻底砸烂“四人帮”》

江青授意姚文元“不要登大庆、大寨的文章。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登一点也不要放在重要位置上”，妄图扼杀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他们扣压了重现大庆艰苦创业的艺术纪录影片《大庆战歌》，对故事片《创业》横加罪名，图谋拍一部把大庆干部描绘成“辛辛苦苦的走资派”的“新”《创业》。王洪文则采用“放虎归山”，上下配合的反革命手段，从内部来搞乱搞垮大庆。他们甚至猖狂叫嚣“大庆是哪个司令部搞出来的？”丧心病狂地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

《红旗》1977年第4期《发扬创业精神 夺取更大胜利》

大庆化肥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亲自批准建设的我国目前最大的化肥厂之一。“四人帮”对这项工程横加指责。他们追查大庆的三十万吨合成氨装置是谁批准的。野心家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她又蛮横地指责“把进口的化肥设备安在大庆，是给大庆抹黑，是给我们丢人”，并且到处叫嚷什么要把装在大庆的进口化肥设备“拿走”，“拆掉”。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阴险，出尔反尔。两年前，他同江青、姚文元一起，明明在有关文件上划过圈，同意将一套进口化肥设备建在大庆，可是后来又翻脸不认账，派人到国家有关部门去追查进口化肥设备的来龙去脉，当有关领导同志向他们说明这些进口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时，他竟气急败坏地狂叫：“不要拿毛主席来压我”，“买办资产阶级就在政治局里面”，反动气焰嚣张到了顶点。

《黑龙江日报》1976年12月29日《大庆化肥厂高速度
高水平地胜利建成》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污蔑大庆的经验“过时了”、“不行了”。张春桥叫嚷“学大庆究竟怎么样，我有些怀疑。”王洪文狂妄地说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要“摸索”，他们在上海划框框、下禁令，搞了三个“不准”：一不准宣传大庆，二不准参观大庆，三不准交流学大庆的经验。一些企业在石化部的组织下，到大庆和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参观学习，“四人帮”事先“打防疫针”，回来要“消毒”，并且恶狠狠地说：“你们不要被东北风、西北风刮昏了。”上棉二厂的全国劳动模范裔式娟同志和厂里的干部、工人，到南通国棉二厂学习办大庆式企业的经验，“四人帮”的亲信污蔑他们“走的是复辟路”、“取的是复辟经”，还把厂党委主要领导干部打成“复辟派”。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交流揭批“四人帮”、学大庆先进经验大会发言《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上海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不仅不准学大庆，不准到大庆去参观学习，反而把大庆的许多重要经验当成错误的东西批判。例如在上海的工厂企业里，不准提加强岗位责任制，不准提“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不准表彰先进，不准开展劳动竞赛，不准提整顿劳动纪律，不准抓职工队伍中的阶级斗争。上棉三十三厂、上钢三厂、上海异型钢管厂、燎原化工厂等单位，这些年来扎扎实实学大庆，却受到“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爪牙的压制、刁

难和破坏。“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还厚着脸皮鼓吹“上海就是大庆”。

(同上)

“四人帮”大叫“社会主义看上海”，……

(同上)

黄涛站在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工地上，恶狠狠地说：“什么学大庆，上海有上海的大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就是大庆。”

1976年工业学大庆座谈会揭发

在辽宁，凡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控制的工矿企业，过去都不准学大庆。学大庆就是犯了他们的“王法”。工业集中的沈阳市，只有六个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企业；轻工业系统只有一个沈阳味精厂是学大庆的先进单位，还被打成“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

《人民日报》1977年5月5日《砸烂帮派体系才有高速
度》

毛远新诬蔑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还胡说什么“大庆十条基本经验，没有几条说到点子上的”，“学来学去，学了个岗位责任制”。

1977年全国计划会议揭发

江青来看戏，她明明知道我们第一个节目是《大庆组歌》，可她到剧院不进剧场，非等《大庆组歌》演完后才入场。

《黑龙江日报》1976年11月10日《以毛主席对〈创业〉
的批示为强大思想武器，彻底批判“四人帮”扼杀
文艺革命的滔天罪行》

话剧《初升的太阳》，生动地反映了大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新型矿区的斗争生活，反映了大庆职工家属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这个话剧是根据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创作的，一九六六年曾到北京演出过，深受工农兵的欢迎。但是，“四人帮”妄图砍倒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对这个戏也横加扼杀，还对剧作者孙维世同志进行残酷的迫害。

《光明日报》1977年5月7日《大庆业余文艺演出队来
京汇报演出》

“四人帮”这个由新老反革命组成的黑帮，使用了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反大庆，其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他们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罪魁祸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现在，我们择其要者，列数他们十大罪状。

(一) 他们恶毒攻击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经验，反对在工业战线上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更是气势汹汹，说什么要追查电影《创业》中送“两论”的情节和“背景”，霎时间，什么“两论”只管改造客观世界不管改造主观世界”呀，什么“两论”只解决向自然界作斗争的问题”呀，什么“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就是复辟倒退”呀，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纷纷出笼。……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大庆吗？不！他们的罪恶矛头是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2日《撼山易，撼大庆红旗难》

江青胡说：“大庆学两论是自发的”，“两论起家是假的”。张春桥则恶狠狠地说：“什么两论起家，毛主席的论多着哩！”明目张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

《黑龙江日报》1977年1月16日《打倒“四人帮”工业学大庆运动更火红》

(二) 他们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在工业战线深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公然污蔑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污蔑大庆根据基本路线精神进行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是“低级的”、“过时了”。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张春桥说：“基本路线教育谁知道正确不正确？”

《红旗》1976年第十二期《在同“四人邦”斗争中 深入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

张春桥说，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1976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浙江同志揭发

马天水等人说，基本路线教育是“资反路线”、“桃园经验”。

上海市农业局揭发

(三) 他们自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在大庆，在全国，他们竭力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我建议大足厂的群众踢开领导班子自己闹革命，组织成新的领导班子。”这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一份文件上的批语中的一句话。王洪文一声嚎叫，“四人帮”在各地的黑干将便跟着鼓噪。一时间，“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甚嚣尘上。

《湖北日报》1977年11月11日《“踢开”论者被踢开》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张洪池和那么几个人，打着“批林批孔、反回潮、反复辟”的旗号，利用职权，召开了一个大会。他们竟然不准大庆市委常委绝大多数成员上主席台。张洪池他们几个人按照王洪文黑讲话的腔调，用恶毒的语言，疯狂反大庆、砍红旗，全盘否定大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成果。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5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四) 他们反对依靠工人阶级，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张春桥有次竟厚颜无耻地说：“上海稳定的经验就是要把另一派彻底消灭”。今年二月，在中央的一次会议期间，王洪文还窜到四川小组得意洋洋地介绍“消灭异己”的办法。

《重庆日报》1976年12月4日《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彻底清算“四人帮”插手四川、重庆的罪恶活动》

精神状态一定要改变，现在好象阻力大，我感到保守习惯势力很大。我们的掌权确实太顺利了，太快了（指机关讲的）。我感觉得要在机关里面找一些有朝气的（当然不都是第一把手）在革委会里面工作。对造反派组织，造反派负责人不依靠，依靠谁呢？

张春桥1967年12月16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核心组会上讲话

张春桥赞扬流氓打群架“不要紧”，流氓捅刀子“是勇敢的行为”、“可以派大用处”他还在公安机关上报处理一个流氓杀人犯的案件上，下达了一条包藏祸心的黑指示，说什么“真可惜！多么勇敢的人啊，如果让他参加打仗，这个人一定是冲在前面的，你们要把这样的人团结过来”。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12日《“四人帮”是破坏社会秩序的罪魁》

王洪文竟然说：“打砸抢都是教育问题”。

《浙江日报》1976年12月6日《反党分子王洪文极右面目的一次大暴露》

王洪文在打招呼会上，还大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派性一万年以后还有，你们这样反派性，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走资派整造反派”，鼓吹资产阶级派性的合法性。

《云南日报》1976年12月18日《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

王洪文：我在组工会议上讲过，反对那种中间派。我的看法，参加武斗的比睡觉的好，就是错了也吸取教训。如果我们党全搞成中间派，使党毫无战斗力，这对党有很大危险性。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在张春桥的直接唆使下，陈阿大在出版系统和青浦等地，挑起了三次大规模武斗，成了闻名全市的打砸抢头子，“那里有武斗，那里就有陈阿大”。陈阿大大搞打砸抢，深受“四人帮”的赞扬和鼓励。王洪文说：“陈阿大有魄力，有胆量。”张春桥说：“你砸了人家，人家也为你扬了名。”

《解放日报》1977年11月20日《陈阿大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对一帮“小兄弟”说：“我是来放火的，反正要闹就闹，要斗就斗，几万人武斗也可以。”（同上）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四人帮”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搞“打倒一切”，“揪军内一小撮”，反党乱军。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江青却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动武斗，支持打、砸、抢，制造全面内战。

《光明日报》1976年11月21日《“四人帮”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铁证》

江青多次叫嚷要打开监狱“找左派”、“放左派”。

《黑龙江日报》1977年1月21日《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公安工作的滔天罪行》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跳出来说什么“我们也斗的挺厉害的……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一定还击”。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7日《“四人帮”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张春桥叫嚣什么“左派力量没有形成，右派势力没有冲垮”，公然把工人阶级分为左右两派。在他们操纵下，有人甚至把工人阶级分成了“造反派”、“变色派”、“右转派”、“温和派”、“投降派”，妄图把工人阶级搞得四分五裂。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9日《打击工人阶级就是打击革命》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洪文窜到我们厂煽动资产阶级派性，他胡说：“两派之间的‘鸿沟’十年也消灭不了。”这是分裂工人队伍的自供。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14日《分裂工人队伍的自供》

（五）他们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他们……把为无产阶级创了大业、立了大功的大庆污蔑为“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把各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广大工人群众污蔑为“替资本主义打基础”。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
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四人帮”肆意歪曲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挥舞“唯生产力论”大棒，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截然对立起来，胡说什么“卫星上天”就会“红旗落地”，搞四个现代化就会“资本主义复辟”；并且故意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叫嚷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甚至把我们发现高产油田，也诬蔑成什么为修正主义“打退却仗，打掩护仗”。搞得抓生产有罪，捣乱破坏有功；干社会主义有罪，吃社会主义有功；完成国家计划有罪，停工停产有功。

《人民日报》1977年5月11日《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
的号召 为建设起十来个大庆而奋斗》

“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上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真是叫人不可捉摸，无所适从。你一抓生产，他们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你号召群众大干，他们就说你是“以目乱纲”；你把生产搞上去了，他们就说你路线错了，“用生产压革命”；生产下来了，他们又说你“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搞得你抓有错，干有罪，……他们还诬蔑开生产会是“白猫黑猫会”，抓生产的干部是“猫牌”干部。

《黑龙江日报》1977年3月6日《揭发批判“四人帮”插
手我省大搞“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滔天罪行》

“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套反动的谬论。王洪文胡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张春桥狂叫什么：“不要怕降低生产速度，下降也可以”，“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污蔑抓生产的同志“工作上辛辛苦苦，路线上必然糊里糊涂”，是“唯生产力论”。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王一平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四人帮”散布：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

《北京日报》1976年12月3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粉碎“四人帮”立下丰功伟绩》

他（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理论，严重破坏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破坏了工农业生产，胡说什么“一锹一镐不用动，路线解决了，生产就上去了”，妄图完全毁掉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9日《打一场人民战争，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滔天罪行》

张春桥散布什么：“我们这个大国，乱一点有好处，乱表现生气勃勃”，“不怕停产，不怕停工”。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7日《紧跟华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穷追猛打根除“四害”》

江青（今年十月三日和五日，突然窜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公然煽动罢工、停产，说什么“那种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了，你还不罢工，不贴大字报？”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9日《狠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他们叫嚣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走资派卖命”，“不为他人做嫁衣裳”，甚至“不怕罢工，不怕停产，不怕社会秩序乱”，“破坏一个工厂，搞乱一个企业，就是给走资派脖子上增加一条绞索”等等。

《人民日报》1977年5月26日《张春桥为什么要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

“四人帮”支持我省极少数几个人千方百计破坏我省大好形势，给我省的革命和生产带来很大影响。谁要好好生产，他就煽动说：“不要给省委书记脸上贴金”。他们把大庆人的革命口号“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篡改改为“革命有理，造反有功，反潮流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

《黑龙江日报》1976年12月20日《“四人帮”是破坏我省大好形势的罪魁祸首》

（六）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企业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大庆是“管、卡、压的典型”。张春桥竟然把工人阶级自觉执行的规章制度同地主阶级压榨农奴的封建枷锁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大庆那个岗位责任制，不是什么新发明，王熙凤整顿大观园，也就是老妈子，小丫头来个岗位责任制”，……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他们把企业的规章制度统统说成是“管、卡、压”。胡说什么“八大指标”是八条“棍

棒”、“七项制度，”是“七条绳索”，连岗位责任制也要批掉。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7日《紧跟华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穷追猛打根除“四害”》

他们反对象大庆那样建立和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王洪文要在上棉十七厂搞一个“不要干部、不要管理、不要制度”的黑样板。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交流揭批“四人帮”、学大庆先进经验大会发言《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张春桥“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姚文元“要总结一个没有规章制度而搞好生产的典型”，

《人民日报》1977年2月15日《把“管、卡、压”大棒同“四人帮”一道埋葬》

姚文元批判的那篇文章，有一段是讲规章制度的，其中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姚文元在这两句话下面划了线，批道：“严密到什么程度？连小便也计算时间那种资本主义制度吗？”“没有比此文赤裸裸的主张复辟资本主义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完全等同。彻底代表资产阶级！”

《人民日报》1977年2月17日《“四人帮”反对“管、卡、压”就是煽动无政府主义》

“四人帮”给《二十条》加的罪名之多，扣的帽子之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什么“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修正主义路线的活标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铁证”、“主张出卖国家主权，竭力推行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等等，在他们看来，《二十条》真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人民日报》1977年7月16日《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条例》是邓小平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发展企业，实为加快复辟资本主义。是鞍钢宪法相对抗，是马钢宪法的翻版，应用毛主席经济思想针锋相对批判。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6年9月2日在全总机关支部书记、大组长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余党竟胡说什么“即使合理的规章制度，群众不拥护，也是管、卡、压。”
《光明日报》1977年3月30日《驳“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谬论》

“四人帮”故意混淆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管卡压的区别，叫嚷“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
《北京日报》1977年2月16日《抓纲治国铁路快上》

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张春桥公然造谣说：“毛主席说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说要建立规章制度。”这是拙劣的诡辩，无耻的谎言。
《光明日报》1977年3月30日《驳“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谬论》

(七) 他们拼命反对大庆“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污蔑这是精神枷锁”，是搞“奴隶主义”。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
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极力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疯狂反对大庆的“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四人帮”以及“归山虎”张洪池和当时大庆领导班子里支持他们捣乱的个别人，胡说“三老”“没有阶级性”，是“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是搞“奴隶主义”。这是极其荒谬和反动的。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4日《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中的文痞姚文元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报刊中公开抛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反动口号。这是“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典型表现。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2日《批判“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例选（之一）》

(八)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积累，把按照国家计划完成财政上缴任务也污蔑为“利润挂帅”。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
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四人帮”说什么：“利润越低越好”，“大家都姓公，核算有啥用”。

《贵州日报》1976年11月26日《搞好经济核算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

“四人帮”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在批“利润挂帅”的幌子下，大批经济核算，大批社会主义积累。他们是亏损有理，扭转亏损有罪。狗头军师张春桥曾经恶狠狠地说：“谁要抓亏损，抓企业管理，你叫他们来找我好了”。他们叫嚷“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鼓吹财政亏空“没什么大惊小怪。”

《浙江日报》1977年4月14日《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

(九) 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之类的反动口号，反对又红又专，反对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张春桥称赞辽宁那个《答卷》作者说，“我们寄予希望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姚文元要人们向这个“先进知识青年学习”。

《新华日报》1977年1月27日《“四人帮”的“石头”》

江青说，辽宁那个《答卷》作者“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故意制造政治与技术、红与专的对立，反对又红又专。……把抓科学技术诬蔑为“技术挂帅”、“白专道路”。他们抬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大捧特捧他“交白卷”，授以高官，赏以厚禄，说成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

《人民日报》1977年5月11日《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 为建设十来个大庆而奋斗》

(十) 他们把无产阶级国家加强计划管理的规定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王法”，竭力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和部门，大搞自由生产，自由招工、自由交换、自由订价，自由上建设项目，……

《人民日报》1977年5月8日《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四人帮”及其余党，反对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十年来，上海没有开过一次计划会议，计划工作机构实际上被砍掉了，综合平衡根本取消了。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列入了计划的，他们卡住不上；国家计划没有安排的，他们从反革命政治需要出发，大搞所谓“争气产品”、“争气工程”。马天水还鼓吹所谓“自找门路”、“找米下锅”，让企业自由生产，自由交换，自由定价，自由招工，自由

发展，造成资本主义泛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交流揭批“四人帮”、学大庆先进经验发言《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

你们看看我们上海工业布局的问题怎么办？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小的武斗，就搞得我们毫无办法。我看有的工厂应该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大的战略演习。但是这个演习还不大，就搞得你们焦头烂额了。如果帝国主义的飞机一个炸了浦口，一个炸了徐州，我看你们上海的工业怎么办？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斗、批、改吗？我看你们还是赶快的搬。”

张春桥1968年2月14日对上海各局已解放的老干部的讲话(潘国平在上海工总司总部整风会议上的传达)

八、禁止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一九七二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吉林省辽源发电厂开展“小指标”竞赛，降低煤、电消耗的好经验，张春桥胡说什么“这样做，会把工人阶级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人民日报》1977年3月10日《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十月四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我们厂开展“小指标”劳动竞赛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经验，并加了编者按语。这篇报道发表后，引起全国各地的注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零六个单位，三千六百多人到我厂参观交流经验。许多省、市的报纸也相继反映了各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大好形势。

可是，“四人帮”对这件事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急不可耐地策划阴谋，兴师问罪。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的报道后，大发脾气，立即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追问：“谁让你们发这个稿子？稿子是怎样来的，要查！”张春桥也别有用心地对《人民日报》说：“上海对这篇报道很有意见，你们去听听上海同志们的意见。”姚文元一面指令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派人到上海“听取意见”，一面指使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布置。这帮家伙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又是召开座谈会，又是“发表意见”，给我们厂的“小指标”劳动竞赛捏造了七条罪状，胡说什么：“小指标”竞赛是“重复九次路线斗争的教训”、是“用生产把工人的思想捆住”，“是对工人群众的污辱”，是“只讲生产指标，生产任务，不引导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是用“竞赛对付无政府主义”，是“求助于奖金”，是“名为奖励先进，实为惩办落后”等等。他们唯恐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群众运动在上海展开，叫嚷要“坚决顶住”，下令上海各报，不准宣传劳动竞赛，不准在报纸上发表先进集体和模范人

物的事迹。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材料《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坚持开展“小指标”劳动竞赛》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又一次在劳动竞赛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一面亲自出马，别有用心地散布“辽源发源厂‘小指标’竞赛错了”一面授意他们在上海的亲信炮制“不做吨位的奴隶”的口号，公然把调度室里挂的记录生产进度、生产指标的黑板说成是“吨位挂帅”，是“唯生产力论”的表现，妄图取消生产指标，搞乱国家计划。在“四人帮”的煽动下，社会上也刮起了一股批判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邪风。

（同上）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再一次在劳动竞赛问题上借题发挥。在他们精心炮制的黑经验中，公然把“小指标”竞赛污蔑是“刘少奇的”，妄图把一九七二年兴起的、一九七五年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打成“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报道报纸上不见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企业里不提了，……

（同上）

“四人帮”对“小指标”竞赛为什么要捏造种种罪名，疯狂攻击呢？这些问题现在清楚了。他们明明知道《人民日报》刊载的小指标竞赛的报导，是经过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的，却穷凶极恶地狂叫要“查”，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利用歪曲攻击这篇报导，把矛头指向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既打上头，又打下头。用“四人帮”的一个追随者的话说，就是：“不出煤发不了电，没有电机器不转，机器不转当权派就完蛋”，以实现他们“层层揪”，“揪一片”的反革命策略，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全国的企业、搞垮国民经济，以便在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同上）

他们诬蔑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穿新鞋走老路”，是搞“唯生产力论”，胡说评选先进是“锦标主义”，将后进的军”，“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甚至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劳动竞赛的指示“过时了”。

《人民日报》1977年3月24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搞劳动竞赛，会滋长个人英雄主义。

马天水1972年11月2日在上海机床厂的讲话

九、反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工矿企业走“五七”道路进行恶毒的攻击

“四人帮”破坏五七干校，张春桥狂吠：“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把广大干部当做“旧人员”，“处理品”，恶毒污蔑干部进五七干校是对“留用人员”的“劳动改造”。他在上海一再叫嚷：“干部多下来，都到干校去”，并说：“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好机会。”王洪文在上海疯狂叫嚣“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来上海说：“我这个人让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的。”发泄对毛主席批判“四人帮”的心头恨。

《人民日报》1977年1月28日《声讨“四人帮”破坏五七干校的罪行》

一九七一年初，当全国各地五七干校逐步转入轮训干部之际，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出中央文件，强调五七干校要发扬抗大的革命传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进一步为办好五七干校指明了方针和办法。穷凶极恶的“四人帮”继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党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张春桥竟胡说什么“要创造点条件，到郊区找个安静的地方，让干部到那里读点书，干扰少。读到头昏脑胀的时候，就劳动劳动，调剂调剂”。

（同上）

对工矿企业走“五七”道路，“四人帮”曾经进行恶毒的攻击和反对。他们诬蔑大庆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是“搞假共产主义”，胡说什么“亦工亦农，那是将来共产主义的事，现在提它干什么！”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5日《积极组织职工、家属搞好集体农付业生产》

十、反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

……“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关心群众生活同福利主义混为一谈，恶毒攻击我们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改善人民群众劳动、生活条件，兴建宿舍，举办一些托儿所、幼儿园和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是搞“福利主义”、“五子登科”。这是他们对抗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证。

《大众日报》1977年10月16日《狠批“四人帮”反对关心群众生活的谬论》

“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把艰苦奋斗同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胡说“八亿人民生活苦点没什么”，叫喊“只要革命搞好了，颗粒无收没关系”，这是他们大搞形而上学的典型例证。

(同上)

你要关心工人生活吗？他们就说这是“小恩小惠”、“物质刺激”、“福利主义”、“收买人心”。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9日《打击工人阶级就是打击革命》

十一、把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打成“黑样板”，为“两个估计”提供根据，反对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同“四人帮”长期争夺的一条重要战线。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如何估计，对知识分子状况如何估计，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四人帮”却完全相反。他们胡说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的绝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就是“四人帮”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

《红旗》1977年第十二期《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其他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一九六六年二月，叛徒江青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狼狈为奸，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又针对教育战线的情况胡说：十七年来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两个估计”的根源，盖出于此。随后，他们不但到处兜售“黑线专政”论，还在文艺上制造从《国际歌》到样板戏的“空白”论，并随心所欲地诬蔑这条战线“修透了”，那条战线要“彻底砸烂”。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按照所谓“空白”论，就达到九十多年，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还长），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是为了打倒一切，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制造理论基础。

(同上)

一九七一年三月，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上海有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提出：“有个问题，恐怕要会引起争论，就是如何估价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教育战线的成绩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张春桥说：“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还有什么争论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张春桥说：现在的教师队伍“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这就为“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了基调。

（同上）

“两个估计”出笼之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每当他们向党发动一次进攻，他们的调子就升高一级。一九七四年，迟群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唱一和，叫嚷说：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要“和十七年对着干”。“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杀气腾腾地狂呼：批判修正主义“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身体”。一九七六年，迟群制造了“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的反动谬论。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夕，张春桥还说什么“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借口教育问题阴谋篡党夺权的真意。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四人帮”的这些胡作非为，并没有给他们鸣起“登基”的“金鼓”，而是为他们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同上）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四人帮”严密封锁了毛主席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五年教育革

命实践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们是绝对不肯也不敢传达的，因为传达了就等于挖了他们的祖坟，缴了他们的械！他们加紧炮制与毛主席的指示根本相反的所谓“两个估计”，要同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到底。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作个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同上)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为了炮制“两个估计”，曾经把上海科技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举办的工人班打成“黑样板”。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7日《上海科技大学愤怒揭发“四人帮”把工人班打成黑样板”的反革命罪行》

“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把教育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千方百计地歪曲、篡改和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光明日报》1976年11月23日《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

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鼓吹一种“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的反动理论。

《文汇报》1976年12月1日《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教育界的滔天罪行》

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培养过工人技术人员，进了学校，就变了，走了白专道路。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还会走白专道路。

张春桥1969年7月21日在上海机床厂热烈庆祝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过去的大学他学的东西，读的书，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这些人掌权的话可以使国家改变颜色的。

姚文元1974年1月17日接见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和部分委员时的讲话

办学校要解决谁教育谁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教育工人，还是工人阶级教育知识分子。

王洪文1975年8月7日接见上海市总工会全体常委时的讲话

在“四人帮”的“帽子工厂”里，飞出这样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曰：又红又专是折中主义。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5日《批判“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例选（之二）》

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还要继续。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没有事。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王洪文1973年9月20日对上海市总工会常委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调了一大堆，事情就不好办（指上海市工人政治学校）。

.....

××，你抓紧一点，工作量大一点，压得他们干不了，就走了。自找苦头吃，砍掉三分之一。这地方不行，我就把它解散，统统赶到五七干校，春桥××也讲过的，不要把知识分子都集中到那里，先砍掉三分之一，看一段，将来也可能还可以砍。

王洪文1975年8月7日在接见上海市总工会全体常委时的讲话

把七·二一大学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首要的一点，我们培养的学员应该成为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

徐景贤1976年7月20日在纪念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发表八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十二、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理论队伍 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妄图要工人理论队伍 为他们篡党夺权摇旗呐喊

“四人帮”欺世盗名，竟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理论队伍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妄图把广大理论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绩，统统记在他们账上。他们竟说什么他们这一伙“最关心和支持理论队伍，使理论队伍迅速成长”。

《人民日报》1977年5月12日《理论队伍建设中的一场激烈斗争——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点体会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这伙阴谋家、野心家居然要用所谓“张春桥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就多次鼓吹“理论队伍的学习内容不要多，主要学习春桥、文元的文章”。另一个余党也肉麻地吹捧“春桥、文元的文章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讲得很清楚”。同时，他们还要理论队伍去学“梁效”、“罗思鼎”的黑文，强令理论队伍对“梁效”的文章“要紧跟，但不要超越”，妄想把“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黑货作为理论队伍的“必修课”。

(同上)

几年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越快，与无产阶级争夺理论队伍的斗争也就越激烈。江青一听说上钢五厂工人理论队伍写了一本《论语》选批，马上下令调去，开动他们御用的写作班子，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修改加工”，改了五百三十多处，塞进许多“批宰相”的黑货，疯狂攻击周总理。然后又由江青派出黑干将，把这本“选批”送给工人，并且责令报纸大登特登，以示他们对理论队伍的所谓“关怀”。

(同上)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通过一些黑文章，篡改唯物论、辩证法，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遭到了许多理论骨干的抵制和反对。例如他们大搞历史唯心主义，竟然把墨子说成是古代“经验主义的总代表”、“两千多年前的走资派”。他们还歪曲历史事实，批李斯，批吕不韦，批霍光，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重机公司理论队伍的同志就向他们尖锐地指出，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竟回答：“历史死无对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何必这样顶真！”工人理论队伍的同志对他们这种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写了《李斯向赵高妥协过吗？》《霍光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等文章，批驳他们的反动观点，但都受到了压制。

(同上)

“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地想利用理论队伍说出他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想做而不便做的事，妄图使理论队伍成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例如，“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多次窜到一个工厂鼓吹：“理论队伍的任务是紧跟形势。要反应得快，跟得快！”……他们还叫嚣：“要把我们这支队伍引导好，这个军队要打冲锋”，要“一声令下，冲锋陷阵”；还叫嚣：“这场斗争有得斗了，要把刀磨得快快的！”

(同上)

近几年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为了给张春桥“当好耳目”，就多次以理论队伍的名义，搞所谓社会调查，为“四人帮”收集情报。有一次，他们的一个余党组织人员去造船系统搞“调查”，这些同志实事求是地调查了革命统帅生产、大干快上的经验，这个余党就大发脾气地骂道：“谁叫你们调查这些的？你们不懂，我要的是炮弹，是给上面打仗用的炮弹！”

(同上)

他们还妄图把理论队伍变成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用来向党中央发动进攻。去年七

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事前物色好一个工人理论骨干，“训练”了一个多月，然后叫她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会议。在会上，上海带队的那个余党定调子，出点子，唆使她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对会议起了破坏作用。事后，王洪文单独接见他们时，这个余党以叭儿狗的姿态献媚表功地说：“我和××（指这个理论骨干）唱双簧。”王洪文大加赞赏地说：“是合唱吧！”又对这个理论骨干进一步怂恿说：“我看了你的发言简报，讲得好！”“四人帮”就是这样坑害工人理论骨干。

（同上）

“四人帮”和他们在上海的余党还经常打着“办学习班”的幌子，选少数“苗子”，拚凑理论班子。他们的一个余党毫不掩饰地叫嚣：“说穿了，我们就和当时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后来又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一样，用我们的观点培养自己的骨干。”他还刻毒地说：理论骨干“有的是鹰，有的是狗，鹰要饿，饱则远扬。狗要喂饱，饿了就对你不忠。”明目张胆地把理论骨干看做他们的鹰犬。

（同上）

但是，“四人帮”却向理论队伍竭力鼓吹走所谓“姚文元道路”，无耻地吹嘘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必经之路”。

（同上）

“四人帮”对理论队伍搞的还是林彪“诱：以官、禄、德”那一套。上海有个青年工人理论骨干，出身工人家庭，开始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劳动也比较积极。“四人帮”却用黑手把他拉过去，叫他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会议，大叛徒江青当面夸他“学得好”，还说：“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学习还不如他”。不久，这个青年就当了干部，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画报、电影、电视上一再出现他的特写镜头，一时成了“风云人物”。在这种糖衣炮弹的袭击下，这个青年搞得昏昏然、飘飘然，迷失了方向，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他才痛切地认识到自己成了“四人帮”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同上）

但是，“四人帮”却以“帮”代党，用“帮”来垄断理论工作，控制理论队伍。几年来，每当中央有关部门在理论工作方面召开会议，布置任务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疯狂叫嚣：“不听它，不管它！”我们听春桥、文元的！”“我们上海还是独立大队！”当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到上海来了解几个单位的理论队伍活动情况时，这些余党就如临大敌，荒谬地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并且布置对这些同志要“不冷不热”，“提高警惕”。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全没有党中央，只有他们的帮中央！”

（同上）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还极力排斥基层党委对理论队伍的领导。大工贼王洪文公开宣称：工人理论队伍的眼睛要盯在党委的缺点上”。“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也说：

“工人理论队伍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另一个余党也摇旗呐喊：“工人理论队伍要绝对归工会领导。”
(同上)

十三、颠倒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同工会的关系，妄图否定党、推翻党、取代党

工总司成立对旧市委是当头一棒，旧市委的老爷都慌了，企图把上海工人运动镇压下去，由于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工总司，春桥签双五条，此时，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王洪文1967年12月29日在《人民中国》记者来上海工总司召开的对日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

反革命分子王洪文胡说：“上棉十七厂的夺权比一月革命早。全国看上海，上海看上棉十七厂。”

《文汇报》1976年12月12日《王洪文反革命原形毕露——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革命大字报巡礼》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洪文就在上棉十七厂炮制了一个假共产党的“特临会”。这个“特临会”的全称叫“中国共产党上海人民公社国棉十七厂特别总支临时委员会”，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由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亲信非法召开全厂党员大会宣布成立的。这个“特临会”不是由党的上级组织任命，而是由一个非党群众秉承王洪文的旨意，同“四人帮”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亲信密谋策划、非法炮制的。“特临会”的纲领是要把一批老干部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把“角刺兼备”的所谓“老造反”拉进党内。

《解放日报》1978年2月20日《把王洪文在十七厂的罪行一条条揭深批透》

……张春桥一语露出了真情：搞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上海工人真正掌握上海的局势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工宣队派出来以后。

《文汇报》1977年6月12日《戳穿“四人帮”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骗局》

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些观点，说“造反派敢冲敢打，敢于打天下，夺天下，但坐天下不行。”

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的讲话

赤卫队一垮台，上海变为造反派的天下，……

王洪文1967年12月26日在《人民中国》记者来上海工总司召开的对日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

姚文元在一个座谈会上叫嚷：“工总司和联络站，与党的“一大”一样。

《解放日报》1977年5月21日《工会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我们“工总司”，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历史，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也证明了，就是代表新生的力量，代表了前进方向的力量。虽然最初看起来，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张春桥1967年12月5日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最近我老想党的问题，党怎么办？几十年的党如何改造？看看你们的报告，怎么提高一点，不是讲眼前的事，而要把我们的阶级队伍怎么从政治、思想上改造到组织上的团结统一，究竟把我们的阶级搞成什么样的阶级。

张春桥1967年11月22日在研究上海“工代会”会议时的讲话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狗头军师张春桥就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别有用心地说：我想将来共产党是不是用工人造反组织来代替，……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8日《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上海市总工会个别头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提出）党究竟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造反派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不要原来那个党支部了，让造反派来起党支部的作用。

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叫造反派也可以。

《北京日报》1977年6月25日《无产阶级大民主不容篡改》

“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早就居心叵测地说：“党究竟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造反派要领导一切。”

《贵州日报》1977年6月22日《一次结帮篡党的丑恶表演》

张春桥妄图取消党的罪恶阴谋破产后，他很快变换手法，假惺惺地说：“看来党还是要的”但是要“重新建设一个党”。

《文汇报》1977年7月6日《“四人帮”要“重建”一个什么党？》

张春桥这个“假革命的反革命”，就曾经竭力鼓吹资本家可以入党。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7日《彻底剥掉“四人帮”的假面》

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底接见上海市部分工代会委员时说：“工会可以发号施令嘛，党组织不执行是错误的。

《文汇报》1977年6月12日《戳穿“四人帮”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骗局”》

“工会最有发言权”，“党委听工会的”，这是“四人帮”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旗号下，鼓吹得最起劲的又一个反动谬论。

(同上)

王洪文和他的“小兄弟”，把各级工会作为他们的行帮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妄图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自成体系，经常碰头聚会。市总工会规定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常委学习”制度。在这种“学习”会上，听取“小兄弟”们有关市革委会各组、办情况汇报，由王洪文或其党羽把“四人帮”的意图、“上面”的精神，向“小兄弟”们“吹风”、“通气”，然后再由“小兄弟”们带回各组、办向党组织传达贯彻，并通过各区、局工会向区、局党组织传达贯彻。王洪文多次叮嘱他在市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党羽，“有事要多和‘老头头’商量”，而不是把事情拿到党组织中讨论研究。许多政治运动由工会发动、领导，许多工作由工会决定，党委去办。作为一种惯例，任免党政干部，要由总工会推荐或征得总工会的同意。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工代会下的命令，支部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不通可以报告上级党组织。

《张春桥在1972年接见上海工代会的部分委员时讲话》〔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处印的材料；王秀珍(1976年11月26日)第二次揭发和交代〕

“回去向革委会进行汇报，今天的会，不仅是工总司开的，各革命委员会也要贯彻”。

王洪文1968年7月28日在上海工总司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工代会在工人中成了主要的临时权力机构。

王洪文1967年6月10日在上海工总司委员第二次整风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还把群众组织说成是领导“核心”，猖狂地叫嚷：“上海的一切权力”不会同任何野心家、小集团分享的”，“别人没有资格来讲话”。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工会要成为在党中央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指挥部。

原中国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6年3月19日在京西宾馆工会“九大”筹备组正副组长会议上传达，事后他向人透露说是王洪文的讲话

“四人帮”极力反对党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让工会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一九七五年，“四人帮”乘党中央筹备召开工会九大之机，公然鼓吹：“工会应是工人阶级的战斗指挥部。”按照这一谬论，党已经不能领导工人阶级了，只有“四人帮”控制下的工会，才能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以帮代会，以会代党。

《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9日《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工运黑线统治”论》

为了利用工会这个合法的组 织作为据点进行反党，他（按：罗锡康）抛出了“工会是工人群众的最高组织”的谬论，妄图盗用“工人名义”向省级机关夺权。他大叫大嚷：“我们是工人阶级，没有占领上层建筑”，扬言要抽调“造反派”“进入上层建筑——省各级机关”。

《贵州日报》1977年12月3日《罗锡康是推行“四人帮”黑纲领的急先锋》

十四、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张春桥污蔑群众“象算盘珠一样，只能拨一拨，动一动”。

《解放日报》1977年10月16日《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批“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罪行》

叛徒江青毒汁四溅，大骂工人“屁也不懂，只知道多产几吨化肥”……

《长江日报》1977年7月4日《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江青狂吠“工人本色就是脏”“我见了工人就头疼！”

《北京日报》1977年6月8日《“四人帮”是迫害劳模、老工人的刽子手》

我愿当工人、当农民，不费脑筋，整天劳动。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2日市总工会召开批判王张江姚反党罪行大会

“四人帮”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群众污蔑为“糊里糊涂”。…那些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的老劳模、老工人，他们更是污蔑为“因循守旧”、沾染旧社会的“污泥多”，“越来越修”，给扣上“既得利益者”的大帽子。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时传祥同志扣上了“工贼”“粪霸”的大帽子。陈伯达也捏造说“时传祥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是工贼”。张春桥、姚文元赶紧摇唇鼓舌，叫嚣“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

《北京日报》1977年6月8日《“四人帮”是迫害劳模、老工人的刽子手》

三十年代，正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那个“见了工人就头疼”咒骂工人“不费脑筋，整天劳动”，“屁也不懂”，“工人的本色就是脏”的叛徒江青，正在大捧国防文学，嘴里哼着污蔑劳动人民的小调，争演《赛金花》之类卖国投降的戏剧，起劲地为独夫民贼蒋介石“购机祝寿”。特务张春桥则忙着写《俺们的春天》那类污蔑工人阶级歪诗，恶毒咒骂工人“象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等等。他攻击工人只会议论“哪个女工漂亮，哪个才结了婚”，把“猫还叫春呢”，何况“咱们是活灵灵的人”这类低级下流的情调硬栽到工人头上，工人阶级被他们糟踏得简直不像样子。

《文汇报》1977年6月12日、《戳穿“四人帮”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骗局》

到了四十年代，张春桥混进共产党内，反对工人阶级的本性没有变。他在石家庄工作时，就紧跟刘少奇，卖力鼓吹“党在城市的工作应依靠贫民”。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严厉批评了这个反动观点。

(同上)

石家庄解放没几天，主编《新石门日报》的张春桥就在报上鼓吹什么“贫民当家”，“贫民作主”，就是不提依靠工人阶级。

《人民日报》1977年5月5日《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当时（按：指五十年代）窃取了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和总编辑职务的张春桥，根本无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而是紧跟刘少奇继续捣鬼，公然说什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不能依靠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大肆散布“工人阶级未必能依靠”的谬论。

《文汇报》1977年6月12日《戳穿“四人帮”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骗局》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

张春桥一次讲话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张春桥在一次“工总司”头头的会议上,对劳动模范进行了恶毒攻击。他说:王进喜是站在保守势力一边的。这些劳动模范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另外,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保自己的荣誉,对继续革命就想得少了。

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1977年3月31日的揭发交代

现在的青年工人更不行,他不懂工人,也不懂农民,问题比较多。

张春桥1969年12月7日在上海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老年工人大量是来自破产的农民,有中农也有地主,有些人到上海,身边钱花光了就做粗活,不要以为他们做粗活、重活,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世界观仍是剥削阶级的。

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在上海工代会部分委员座谈时谈话纪要

你们各位也可以作些调查,看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我们不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吗?那么,阶级队伍的状况怎么样呢,还是要作阶级调查。

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接见上海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的讲话

我感觉有些说法有些乱了。依靠整个工人阶级,好像工人内部没有矛盾了。那就不合辩证法了。

张春桥1974年10月14日谈话

我们工人自己也有弱点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如农民呢,一个农民的生产,是全过程的。一个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工种,有的前道或者后道工序就不知道了,有的早班晚班也不联系。这是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的。看不到全局。

张春桥1975年1月9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篡党夺权,千方百计为自己树碑立传,作舆论准备。“四人帮”的黑军师张春桥,曾授意要上海搞所谓“现阶段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他的亲信竟叫嚷要写一篇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样的文章,还狂妄地提出什么“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张春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狗胆包天,妄图与光辉的毛泽东思想分庭抗礼,这简直是无耻之极,反动透顶。……总工会秉承张春桥的黑旨意,化了四年之久,以后对上海市一百二十多个单位进行了所谓的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张春桥,这个“四人帮”的狗头军师,污蔑毛主席只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一些问题“说不清楚”,狂妄地想出一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是,动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指示市委有关组办和总工会等有关部门、组

织大批人力，为他作基础调查。别的地方不说，光拿我们总工会和工交组来说，根据张的一些黑指示，上上下下就调动了上千人，平均每人化费了近一年的时间，调查了一百多个单位，十多万个职工。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
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1月20日

张春桥在一封黑信中胡说：毛主席只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则“不甚了了”。“四人帮”下达黑指示，在上海大搞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调查，自吹自擂地说这一调查“同制定路纳、方针、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解放日报》1976年11月18日《“四人帮”大造反革
命舆论妄图篡党夺权》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的一天，在一次选择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会上，在谈到有关老工人的一条语录时，张春桥说：“有人（显然是攻击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喜欢讲依靠老工人，这不对。对老工人也要阶级分析。”姚文元听了很活跃，说：“你老兄欣赏的这条，一定选上。”

肖木1976年10月22日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到北京去，说到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时，张春桥攻击陈永贵同志：“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我当时说：“那王铁人活着就好了。”他马上说：“也不见得。”

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1977年3月31日揭发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197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上所
写的攻击毛主席的旁批

为了配合张春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我们还利用全面专政这篇黑文，大肆鼓吹张春桥的反革命思想，把张春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黑货吹到与列宁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还布置我们搞工人队伍的调查，搞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炮制张春桥那个反革命思想体系服务的。

朱永嘉1977年3月7日的揭发交代

朱永嘉、王知常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上，污蔑和分裂工人阶级，把工人队伍分成四部分。胡说什么：第一部分是老工人，他们“有的解放前就当包工头的，有的是技术工人、工资很高，革命到顶了。也有很好的老工人，受

苦深。他们也有短处，地位变化了，生活条件变化了，继续革命觉悟差了。”第二部分是，“解放前后当艺徒，‘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对党有感情，现在是工厂里的主要骨干。他们的问题是物质刺激的多，受苏修的一套影响多，动不动要搞管、卡、压，动不动要搞物质刺激那一套。”第三部分是，“五八年前后进厂的，这些人吃修正主义的桃子不多，不少人还是临时工，吃过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六六年起来造反，路线斗争觉悟高，造反精神足，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问题是党的观念少一些，劳动关没完全解决。什么事可干，什么事不可干也弄不懂。有些人造反有私心杂念，掌权后老是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新的流氓无产阶级，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用过这种人，蒋介石就靠了这些人。这些人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基础。”第四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六八年进厂的新工人，他们热情、单纯、学习努力，反映快，斗争经验很少，幼稚，没经过锻炼。”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下属工业经济组王复初同志1977年
6月16日揭发

十五、炮制“工运黑线统治论”，从根本上否定 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工运战线的统治地位

你们（按：对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眼里没有毛主席，没有常委，也没有群众，只有你们的刘主席。

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见反动组织“全红总”头头时的讲话

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给负责吃饭住宿。你们听到了吗？
（同上）

〔反动组织全红总代表说：“我们昨天（二十五日晚）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北京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封全总。〕

江青：“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
（同上）

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大野心家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到处宣扬：原总工会会有百分之九十都是乌龟王八蛋，并把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进行逐个审查。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
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上海）总工会党组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的，……初步揭露一下就揭发出一大批特务，据我们了解，那里面问题还大呢！还有现行反革命！

王洪文1967年12月22日在铁路局大会上的讲话

王洪文胡说，原总工会干部百分之七十五是叛徒、特务、地上工福会。

《解放日报》1977年11月15日《“四人邦”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

能够开一个一万几千人的工人代表会议，这个在上海的工人运动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呢！过去上海总工会开一次代表会议，才有多少个代表啊？而我们呢？一开代表会议就有这么多人来开，这证明过去的上海总工会，是脱离群众的，脱离工人的，而我们的“工总司”，是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创造的，这样，也就证明原来总工会那个组织，不能不垮台，而“工总司”一定会胜利！

张春桥1967年12月5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确实是资产阶级、地富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情况不仅是电影界，那个单位都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少不了。

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讲话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国民党的一套，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5年12月5日在筹备组正副组长会议上的发言

工会是砸烂，还是怎么办？我是趋向砸烂。

王洪文1967年10月4日在工总司常委学习会上的讲话

总工会不砸烂，我王洪文就无立足之地。

见上海市总工会机关和直属单位彻底揭批“四人邦”及其余党王秀玲反革命罪行大会发言汇编

对总工会、福利主义要彻底批判，这是刘×一套，包括劳模制度，全要批判。

姚文元1967年10月3日接见市革委会工交财贸组时的讲话、太原市总工会五战团编（第二期）1967年12月25日

春桥××在六、三报告中讲了，过去工人运动、工会工作那一套，就是刘×的一套，我们要在大批判中很好地批判，……

王洪文1967年5月19日在杨树浦区“顾阿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事迹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春桥说，上海工总司与旧工会有很大不同，旧工会一开始就搞经济主义。

王洪文1968年5月31日在“向门合同志学习”大会上的讲话

所以我们想象，为了使工总司领导更健全，它的领导不脱离群众，也应该开一个会（指工代会），逐步的使领导更健全。……

我们看，能不能早一点，把它简化，时间不要长，一年多开几次，这样使得我们工总司就不致于走原来全总这样的路、总工会这样的路。“全民工会”咱们是不能干的，一定要保持我们的阶级的队伍、阶级的组织，也不能把它变成经济主义的组织。福利主义的组织，我们工人造反派这个组织，要能够想一切办法保持它一直是在那里搞阶级斗争，不能象全国总工会或上海市总工会那样。

张春桥1967年9月在上海工总司的一次讲话

工总司是工人群众革命的战斗组织，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作战斗。联系到过去旧工会的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其要害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革命性，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王洪文1968年4月在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想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为什么要起来造原工会的反？还不是因为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什么全民工会，什么工联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原工会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抓阶级斗争，不抓思想教育，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躯壳。结果，大家起来一冲，就把它冲垮了。

王洪文1973年4月16日在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团结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过去工会的要害是不抓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推行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修正主义工运方针，使工会的阶级性模糊了。工会的要害是不抓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不解决，新的工会建起来，还会走老路。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5年12月22日在机关党总支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筹备工作中，省市工会的领导要求把工运路线搞清楚，下边还提出对过去的工会工作要有个估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与当时社会上的一股翻案风有关系。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5年12月4日在筹备组正副组长会议上的发言

建国以来，工运战线一直斗争激烈，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总想把工会作为复辟工具，抓工会这个阵地，两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三位一体”修正主义路线要害是不抓阶级斗争，

不同走资派斗争，失去革命性、战斗性。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6年5月31日全
总组长、支部书记会议上的发言

“四人帮”为了利用工会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极力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工运战线占统治地位，恶毒污蔑广大工会干部是“旧人员”、“资产阶级代理人”。

《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9日《彻底批判“四人帮”
的“工运黑线统治”论》

“四人帮”的“工运黑线统治”论，是适应他们阴谋搞垮工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变工会为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反革命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这个反动谬论，发端于叛徒江青。她恶毒咒骂工会干部“眼里没有毛主席，只有你们的刘主席”。国民党特务张春桥污蔑工会“完全是按刘少奇的一套搞的”。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叫嚷“对总工会要彻底批判”。他们一伙狂吠贯穿工会十七年的“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砸烂旧工会”。他们歪曲事实，把工人运动的路线是非完全颠倒了。

（同上）

“四人帮”这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罪恶行径，受到广大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的抵制和斗争。一九七三年，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各地整顿、健全工会组织时，许多工会干部强烈要求把工会十七年的路线是非搞清楚，认为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会斥之为黑线统治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对此进行疯狂反扑，辱骂工会“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躯壳”。“四人帮”在工会的党羽，也把前述正确意见污蔑为“右倾回潮”，公然大批“红线主导论”，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把一些反对“工运黑线统治”论的干部打成“复辟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有的甚至被赶出了工会大门。一九七五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会九大筹备工作开展后，广大工会干部又一次强烈要求正确估价十七年的工会工作。有的同志建议，是否可以明确一下，建国以来，工会工作总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然而，“四人帮”在工会九大筹备组的黑干将，却把这些正确意见作为“右倾翻案”言论大加批判，大揪工会里的所谓“正在走的走资派”、“代理人”、“旧势力”。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四人帮”的黑干将在《人民日报》头版抛出了一篇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反党黑文。在这篇黑文中，他们恶毒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叫嚷对工会十七年必须“彻底否定”。

（同上）

十六、篡改工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妄图把工人阶级的工会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帮会

我们考虑开个会（按：指工代会），……不要一听到开大会，就要筹备两个月。时间不

要长，一年多开几次，使工总司不要走上海总工会那条路。总工会变成了全民工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教授也是工会会员，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也不要变成经济主义，福利主义的组织。总工会哪有阶级斗争啊！工人造反派要保证搞阶级斗争，不要专门搞疗养院、搞劳动保险，那完全把工人阶级引导到脱离阶级斗争上去。实际上工会过去脱离了党的领导、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这个。我们搞这样大的工人造反派不容易啊！我们要保持这个阶级队伍。

张春桥1967年10月6日在《上海工总司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立即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用工人造反派改造工会，主席早就讲了，在去年签字时就讲了。列宁讲要把工会办成马列主义大学校。

张春桥1967年6月10日在上海工总司委员第二次整风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全国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工人运动，如何使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那个是造反派，那个是保守派，阵线已经划清了，……

张春桥1967年9月8日接见上海工总司部分委员时的讲话

一年多我们主要精力化在工人运动上，工人运动不搞好，上海局势不能稳定，工人运动搞得不好，上海局势就稳定。我来一个月有半个月时间是花在工人运动问题（上）的，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张春桥1967年12月10日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讲话

到解放后，拿电影界来说，他们把各式各样的电影厂都收下来了，当时我曾说过，别的还有私营，电影厂倒一下都变国营。其实那是做了一笔政治买卖，包庇资本家，把他们收买到国营厂，当职工，还参加工会。给了他一个身份，我们给了一笔钱，把资本家的股票买下来，再把人买下来入工会。

（同上）

这个会（工代会）不是阶级的所有人都来，而是工人造反派来，造反派在这中间应起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上海这个阶级队伍搞好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就有保证了，取得的胜利也能巩固起来；我们的阶级队伍搞不好，胜利靠不住，有两种：一种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第二种取得彻底胜利，也不能巩固。

张春桥1967年11月22日在研究“工代会”会议时的讲话

春桥××给我们总结了，上海工人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反对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打退陈曹掀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在反经济主义基础上夺权。这我不敢讲国际工人运动中是没有的，至少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大反经济主义的还没有。

王洪文1973年4月22日在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请你们起草一个工会的章程，最后报中央定。先写个草案，发给群众讨论，然后中央订全国的章程，包括经费问题，会员问题。什么人可以参加工会？太多了，又会说是全民工会，是群众组织太少了，不行。什么范围的人可以参加？总之，要使它保持阶级的面貌，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要花点功夫进行研究……

参加工会，产业工人问题不大。集体所有制、店员怎么办？是搞统一工会呢？还是店员单独搞工会？机关干部参加不参加？这里有实际问题，又有理论问题。

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接见上海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
的讲话

会员不能匆匆忙忙的搞。会员，我看工代会开了后再解决。有一条可以定，这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不能把非工人阶级都弄进来。要调查研究，要一个一个整顿。弄了一个庞大的阶级队伍就不好办了，再不纯就更不行。不要用我们的手弄老样（子），他们已经搞过（全民工会）。

财贸店员算否工人的问题，不能现在讲死，现在可以宽些，以后再定。

张春桥1971年4月6日、10日对召开上海市工代会问
题的二次讲话

对文教卫科研单位这次考虑不选代表。不考虑不是说挂起来，是否建立工会，待全总成立后再研究。主要考虑到这些部门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属上层建筑。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是一个阶层，既可依附资产阶级，也可依附于无产阶级。如建工会，不利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思想改造。进了工会等于划了阶级，不利于团结。这次不考虑。也不能挂起来，也不能许愿，……

精神要慎重。文教卫建立工会究竟干什么？要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指示，要好好研究。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第一步不是建立党的组织，而是建立工人协会，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革命。

全总刘沛行同志笔记，记录1975年3月15日金祖敏传
达张春桥的讲话

上海写了调查报告，主张文教卫生不搞工会。……

原工会“九大”筹备组组长金祖敏1975年12月5日在
筹备组正副组长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建议把工业组、交通组撤销，因为我们主要是抓政治，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教育，不要成立业务部门，这有道理。

王洪文1967年12月7日在上海工总司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一次会议上，××在传达中说：“洪文讲生产不能抓，否则就要走上旧工会老路”。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上海市第五届工人代表大会以后，总工会曾设立“生产生活组”。可是，“四人帮”的王洪文和上海的马徐王知道竟下令撤销。

(同上)

你总工会设个生产组，你就能把生产抓起来？你抓生产，工交组干什么？不要以为工会有七项任务，就去一个个套，搞七个组。

王洪文1975年8月7日接见上海总工会全体常委时的讲话

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四人帮”搞“三箭齐发”，阴谋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在上海，则由他们控制的市总工会打头阵。王洪文、张春桥扬言：“要选一批‘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开开刀，要放手让工、青、妇去搞，出点乱子也不要紧。”张春桥还凶相毕露地说：“一月革命也不可能把所有单位的领导权都夺过来，有的夺过来又失掉了”，公然要进行再次“夺权”。王洪文还专门下黑指示说：“总工会要抓大事”，“其它事可以不去管他”。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运动一开始，马天水还要叶昌明收集分析运动情况，要总工会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强调要分析区、县、局党委的态度。胡说什么“现在工会是生气勃勃，比较敏感。”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中国工会‘九大’筹备组理论组”署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四人帮”一手策划炮制的。姚文元在文章的关键之处亲笔加上工会要“领导工人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强调这是工会的历史经验总结和工会的根本任务。

《人民日报》1977年4月8日《揭穿“四人帮”利用工会篡党夺权的阴谋》

工会要“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口号一出笼，窃据某些地方工会领导职务的“四人帮”的亲信，欣喜若狂，更加疯狂进行罪恶活动。他们打着“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旗号，肆意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大搞打砸抢，煽动停工停产，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充当了“四人帮”搞乱地方的急先锋。他们有的搞什么“工管”，叫嚷要象过去“军管”那样实行“工管”，在一些企业抢印夺权；有的搞什么“工人检查团”，派往一些单位，强迫党委按他们的意图办事，有的搞什么工会“宣讲团”，到处鼓吹“夺权斗争”，有的自上到下拉起山头，狂叫“要象割韭菜那样把所有老家伙一批一批搞掉”，由他们来掌权。被王洪文、江青看中的某省总工会的那个野心勃勃的人，更是煽动“层层点火，处处冒烟”，叫嚷要“烧得走资派团团转”，“省委瘫痪了我们来”。去年夏天，他又窜来北京，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华国锋同志，真是猖狂已极！

(同上)

新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曾授意湖北的黑干将对省委要采取“内紧外松，上促下攻”的行动方针。“四人帮”在上面压，黑干将们在下面攻，逼着省委“快转弯，转好弯”，解决好“造反派掌权的问题”。

《湖北日报》1977年11月11日《踢开”论者被踢开》

一九七六年，胡厚民贼心不死，他竭力要把“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推行到工运路线。他在省总工会机关散布什么：“民主革命时，工会任务很明确，斗封建把头；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会任务就应该是斗走资派”。

《湖北日报》1977年12月6日《阴险狡诈的狗头军师
胡厚民》

“四人帮”为了要工会“指挥”工人群众同他们所谓的“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战斗”，使工会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有力工具，费尽心机地阴谋抓两项措施：一是“工人干部”，二是“工人民兵”。王洪文早就狂妄地叫嚣：“上海只要抓住十万干部，一百万民兵，就可以坐天下了。”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人民日报》1977年4月8日《揭穿“四人帮”利用
工会篡党夺权的阴谋》

“四人帮”炮制“工运黑线统治”论的险恶用心，是从根本上篡改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会说成是“旧工会”，是什么“全民工会”、“生产工会”、“福利工会”。这完全是造谣和污蔑。

《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9日《彻底批判“四人帮”
的“工运黑线统治”论》

十七、反对周总理提出的、毛主席党中央肯定的“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工会组织领导原则，反对把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工会章程

光有民主集中制，解决不了上下级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

……路线不对，规定民主集中制也搞条条专政。

以地方为主，民主集中制写在哪里？

王洪文在1975年6月9日晚讨论工、青、妇章程时的讲话

全国性的行业工会是不搞了，将来国外来的纺织也好、冶金也好，都由总工会统一接待。……全国不搞产业工会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

王洪文1973年4月22日在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不是个党的章程，而是工会的章程，要通过工会章程指导工会整个工作。不要与现实无关系。这个问题我也说过，要结合工会现状，……不要怕说我们章程革命性不强，……不要怕说不写基本路线不革命，不要脱离现实。

王洪文在1975年4月9日晚讨论工、青、妇章程时的讲话

黑干将金祖敏在工会“九大”筹备期间，还顽固反对把周总理提出的“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写进工会章程，恶毒诬蔑坚持这一原则是“右倾翻案风”，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在金祖敏把持下，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工会九大筹备组先后修改了六次工会章程草案，这个工会组织领导原则每次都遭到金祖敏一伙的蛮横反对，一直没能写进去。更为严重的是，在“四人帮”另搞一套期间，金祖敏竟然在他亲自批发的一期学习简报中，恶毒诬蔑坚持周总理提出的这一原则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一九七六年七月，由金祖敏直接授意编造的《右倾翻案风中全总机关的部分奇谈怪论》，公然把周总理提出的这一原则编了进去，印发机关批判，从而在机关掀起了一股批判周总理提出的“产业和地区相结合”原则的妖风，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1977年12月23日王春生同志在全总机关揭批“四人邦”及其黑干将和黑联络点罪行大会上的发言《彻底清算“四人邦”黑干将金祖敏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滔天罪行》

十八、利用群众组织和工会阵地，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拼凑黑班底

我们工人同志要准备打比较长的仗，这样的来重新组织我们的队伍，重新教育人。把我们从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领导机关，按照毛泽东思想来重新检验，……

张春桥1966年11月21日对上海工总司工人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说：有多少新干部？（金祖敏说，结合到革委会的有百分之六十七）如果加上造反队的，还要多一些。那有几万人了，其中有一部分不好的，有什么奇怪呢。三七开嘛，下去的是百分之二十八，那有百分之七十站得住，就不错了。

……

工总司的同志，包括下面的新干部，总的还是好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从长远看，更要有一支力量。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接见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间，张春桥、姚文元来到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上海代表团住地，张春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你们‘工总司’哪一个能代表工人？王洪文是保卫科的一个干事，根本没有摸过机器，你是从东北到上海读纺织工业学校的毕业生，也没有上过机器吧？你们能代表上海工人阶级？我看都不能！没有我们的支持，我看你们还不知是个什么局面呐！这话很清楚，张春桥可以任意授予“工人阶级”的称号。而张春桥要封王洪文这样的政治流氓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正是出于反革命帮派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汇报》1977年6月12日《戳穿“四人帮”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骗局》

小将如果再有三年，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还会大大提高，那时我们的政权就会巩固下来。

张春桥1968年2月23日在上海的一次讲话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就到处吹捧张春桥、姚文元，说什么“如果没有春桥、文元的指导，我们早就垮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街头出现了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王洪文立即召集他的“小兄弟”开会，狂叫：“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死保！”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王洪文“死保”张春桥，张春桥也借助王洪文那支“小兄弟”的帮派力量。他在上海的一次会上对别人说：“是我把他们（指王洪文等人）搞起来的。”当面又对王洪文等人说：“过几年，你们有的可能是市委书记、副书记，有的是中央部长、副部长。”从此以后，王洪文就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育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三位首长（指江、张、姚）联系在一起的。”张春桥也得意地说：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话，他们就算数”。为了篡党夺权，他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结成一帮，狼狈为奸。

（同上）

陈阿大私下对人说：“王洪文是靠牢张春桥的，阿拉是靠牢王洪文的。”他发誓要“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解放日报》1977年11月20日《陈阿大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姚文元的老子姚蓬子不就是罪恶累累的叛徒、特务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上窜下跳，组织了什么“劲松战斗队”，居然当上了“头头”，还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王洪文得意地说：“姚蓬子参加了工总司，后台就更硬了。”

《光明日报》1977年10月26日《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剖析》

当年同王洪文一起混入造反派组织的，还有一些一直紧跟王洪文的人，王洪文把他们当作亲信，提拔安插到各级工会组织或者“文攻武卫指挥部”，有的则用工宣队的名义，派往大专院校、文教单位，进驻市、区、省、局机关，掌握实权。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天水××讲，在正常情况下，老干部总是要比新干部早死，当然如果搞汽车去游山玩水被摔死，那也就早死了。还是要靠新干部，因此要对新干部关心、爱护、教育、培养。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在接见上海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上海的新干部拉的已多了，究竟是不是拉得住，那还要看。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在接见上海工总司委员时的讲话

春桥讲工人中干部要经过工总司。

王洪文1972年3月30日在上海工总司整风小结会上的讲话

“四人帮”为了结帮篡党，首先控制市总工会的领导权。政治流氓、典型的新生产阶级分子王洪文，一向把“工总司”演变过来的市总工会看作是他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市第五次工代大会后，王洪文窃取了市总工会主任的职务，就把他的几个“小兄弟”统统塞进了市总工会领导核心，封为市总工会常委、付主任，把持了市总工会的要职，自成系统，称王称霸，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接着，他们就打出“培养干部要通过工会组织”的旗号，利用市总工会培植自己的帮派势力，进而控制各级党组织，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结帮营私，把他们的帮派势力安插到各级党组织中去。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1日《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上海市总工会个别头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造反造到市里可以当市长，造到部里可以当部长，最小可以当个厂长。

上海市总工会编《大工贼王洪文的反革命真面目》

七三年张春桥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另立三条干部标准，一是“要培养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工人，”二是“有十几年、二十年的工龄”，三是“经过三大革命锻炼，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接着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又在一份文件上写道，要“注意在批林批孔斗争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的积极分子。……这两条在组织各种领导班子时，往往临时抓，也往往靠不住”等等。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1月15日

但是，如果认为仅仅是这少数人死死地抱成一团，那也错了。是组织总想发展，是帮会总想扩大。那么扩大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呢？张春桥说：提拔干部“要领导熟悉，群众拥护”。王洪文说：选人“要对工总司有感情的”，“档案只能作参考”，“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张春桥甚至气势汹汹地说：“穿小裤脚管（即流氓阿飞服装）的为什么不好当常委？”十分清楚，他们“选拔干部”就是以“四人帮”熟悉，对“四人帮”有感情，为“小兄弟”们所拥护为标准的。选拔的标准是如此荒唐，选拔的方法更是我党历史上所绝无仅有：先是派人员物色“苗子”，继而到市总工会去“培养感情”，再举办“随便学点什么”的学习班，最后由“四人帮”的亲信去谈话“相面”“相”中了就破格提拔。这样，有些为粪蛆所生、腐质所养的极不干净的东西，纷纷进帮入伙，被“四人帮”赐以高位，授以大权，赠以厚禄。而这些人也大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王司令”，感激涕零，效忠不贰。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他们露骨地说：“不管杀人放火，只要有‘造反精神’就行”，“叛徒没有关系，只要江青相信就行”。这就是说，不管新老反革命，还是地痞流氓，只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

卖命效劳，都可以得到重用。

《长江日报》1977年7月4日《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吹捧坏人，陷害好人，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他们把那些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那些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好同志，统统诬蔑为“驯服工具党员”“奴隶主义工人”和“光拉车不看路的干部”，鼓吹做老实人“吃亏”、“落后”、“倒霉”等谬论。而对那些政治野心家、“江湖骗子”、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一概捧为“英雄”，树为“典型”。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4日《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七三年八月，王洪文在市组工会议上公开叫嚷，老干部各方面表现好的，可多安排一些付职，照顾性的职务。市五次工代会召开以后，各级工会都相继召开工代会，王洪文、王秀珍、叶昌明等人就借口工总司的特殊性，下令工会班子一个老干部也不许放，由于老中青三结合是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导的，一些区县局工会也提出工会班子老中青三结合的要求，王秀珍、叶昌明等人迫于形势，就说什么，工会班子只许放一个老干部，这个老干部要对工会有感情的，只好作参谋、顾问，不可主持工会日常工作。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编选》1976年11月15日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时，用他特有的流氓语言，特地关照在上海的余党“有事情要多找一些老头头商量，”这些“老头头”“到时候就有用”。张春桥更是露骨地大喊：“主要靠工会”。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一九七三年四月下旬，王洪文急急忙忙布置王日初，举办所谓学习班，物色对象。王日初说：“这是洪文同志回京前亲自交办的任务，要在一个月内办完二百多个人的学习班。”又说：“随便学点什么都可以，越快越好。”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1月20日

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对总工会的一些常委说：“上海这么多中央委员，中央是考虑调的，但不一定马上调，在座的同志也可能要调。外面有人讲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们不要翘尾巴，要谦虚谨慎；但也不要磨掉棱角，不敢反潮流”。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1月15日

上海十四名十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其中百分之五十是总工会的正付主任，常委及委员，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中，有五名是总工会委员。在中央和国务院各部以及其他部门工作的有六名总工会头头。这还不够，四人帮指使马、徐、王，还要物色挑选三十名部长级干部，准备输送中央，一旦时间（机）成熟，去夺中央各部的领导权，他们的阴谋被敬爱的周总理识破没有得逞。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王洪文公开说：“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青年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

《解放军报》1977年2月5日《四人帮在四届人大前后妄图“组阁”夺权的滔天罪行》

张春桥就不止一次地嚎叫：“上海要出人才，出干部，要像割韭菜一样，把一批又一批的干部送到中央去”，“特别”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得他个天翻地覆”。他还对在上海市的亲信说：“你们准备都调走，上海不仅本市，还有个全国的问题。”他们多次密谋从上海往中央选派“部长”，往外省选派“省委书记”，往外国选派“工人大使”……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现据四人帮的黑干将王秀珍交代：王洪文在十大后就讲，“十大中小兄弟没有一个进中委，有点摆不平。”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1月17日

王洪文问：“×××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厂里反映怎样？”（×××答：大家听说他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还不相信哩！感到突然，有个别同志不理解，怎么×××一下子选进了中央委员，他到××大学去有多少功劳？）王洪文：他到××大学有很多功劳，有反潮流精神。但你们也不能认为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好得不得了了。在总工会常委中，在上面的已好几位了，无非是多培养点人。……上海广大产业工人要为党输送干部，上海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不少，要上海新增加八个中央委员，我连夜给金祖敏打电话。”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6年12月6日

他们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干部和劳动模范诬蔑为“投降派”、“保守派，”极力排挤打去，公开反对选为工会“九大”代表和委员候选人；对那些跟着他们跑的专门煽风点火，为非作歹的人，不管什么牛鬼蛇神，一概封为“造反派”“新生力量”，突击发展入

党，突出选拔为干部，拉进领导班子。

《人民日报》1977年4月8日《揭穿“四人帮”利用工会篡党夺权的阴谋》

王洪文及其党羽还经常以办学习班为幌子，对他那帮“小兄弟”进行所谓“造反史传统教育”，灌输“要为司令争气”、“要为在中央工作的上海几位领导争光”等反动思想。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凡是符合帮的“标准”的，他们就指名入党，限期提干。如窃据上海市财贸部门领导职务和坐镇上海市总工会的那两员“虎将”，就是由王洪文、张春桥分别指名入党。

《解放日报》1977年4月2日《“五虎将”是怎样混进党内的——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

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不是党员的时候，张春桥就指定他是“九大”代表，后来又拉进四届人大当常委，甚至还出现了先当党委书记后入党的咄咄怪事。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在把“五虎将”拉进党内的过程中，一不准原单位的党支部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二不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违反党纪，为他们涂改档案，伪造证明。

《解放日报》1977年4月2日《“五虎将”是怎样混进党内的——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张春桥说：“翁森鹤有才干，要培养”。

1976年工业学大庆座谈会揭发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翁森鹤扯起“造反”旗号，到北京“上访”时，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又是接见，又是鼓励，指使他回浙江继续大搞打砸抢。一九六七年，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单独接见翁森鹤，吹嘘他“是全国工人运动造反最早的头儿”。新生资产阶级王洪文，把翁森鹤作为他的“小兄弟”。一九七三年，王洪文两次找翁谈话说：政治上翻身“要自己去斗争”，“要顶住十二级台风”。选“十大”代表时，王洪文下令：“浙江选工人代表，要把翁选上”。他们不顾本单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党员的反对，硬把翁森鹤充作“十大”代表。翁森鹤伙同“四人帮”在浙江的亲信疯狂反党夺权，王洪文一概予以支持、鼓励。翁森鹤得到“四人帮”的宠信，野心越来越大，他说是“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

天下，开会讲着坐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

《解放军报》1977年12月11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

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之流就是他们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翁森鹤一贯野心勃勃，思想反动透顶。他经常研究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反动权术，公开扬言当工人没有意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大搞打、砸、抢，得到了“四人帮”的赏识。在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支持下，翁森鹤很快钻进党内，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杭丝联厂党委委员、厂革委会付主任。翁森鹤与王洪文称兄道弟。翁森鹤吹嘘自己“比王洪文早三天造反”，王洪文称翁森鹤是“老战友”。党的十大前夕，王洪文不顾杭丝联绝大多数党员、工人的强烈反对，一手策划让翁森鹤当上十大代表。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王洪文又指名要翁森鹤和“四人帮”在浙江的一个亲信和另一个新生反革命分子列席中共浙江省委常委。这样，翁森鹤杀气腾腾地叫嚷，“批林批孔要解决中央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要扫除反对派，巩固王洪文的地位”，疯狂地为“四人帮”搞“第二次夺权”效劳。他肆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胡说：“林彪、孔老二都是‘死老虎’没有什么好批的，现在要批‘活老虎’”。公开叫嚷要揪某某负责同志的“师付”，还要揪“师付的师付”，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负责人。他还恶毒地咒骂革命老干部，胡说“老干部是儒家，是复辟派”。谁讲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批资本主义，他就说你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向下，整群众”，并作为一条罪状向“四人帮”写黑报告。他到处鼓吹“矛头向上不会错”，煽动一部分人冲击党委领导机关，离开生产（工作）岗位，哪里先进就往哪里冲，哪个工厂冒烟就往哪里攻，到处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人民日报》1977年5月17日《清除“四害”杭丝联又大步前进了》

王张江姚直接插手浙江，反对中央的指示，为坏人翻案，甚至狗胆包天，篡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偷偷地删去了毛主席亲自点名批判的那个坏头头的名字。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8日《打烂“四人帮”浙江有希望》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民中只是极

党，突出选拔为干部，拉进领导班子。

《人民日报》1977年4月8日《揭穿“四人帮”利用工会篡党夺权的阴谋》

王洪文及其党羽还经常以办学习班为幌子，对他那帮“小兄弟”进行所谓“造反史传统教育”，灌输“要为司令争气”、“要为在中央工作的上海几位领导争光”等反动思想。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凡是符合帮的“标准”的，他们就指名入党，限期提干。如窃据上海市财贸部门领导职务和坐镇上海市总工会的那两员“虎将”，就是由王洪文、张春桥分别指名入党。

《解放日报》1977年4月2日《“五虎将”是怎样混进党内的——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

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不是党员的时候，张春桥就指定他是“九大”代表，后来又拉进四届人大当常委，甚至还出现了先当党委书记后入党的咄咄怪事。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罪行》

“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在把“五虎将”拉进党内的过程中，一不准原单位的党支部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二不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违反党纪，为他们涂改档案，伪造证明。

《解放日报》1977年4月2日《“五虎将”是怎样混进党内的——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张春桥说：“翁森鹤有才干，要培养”。

1976年工业学大庆座谈会揭发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翁森鹤扯起“造反”旗号，到北京“上访”时，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又是接见，又是鼓励，指使他回浙江继续大搞打砸抢。一九六七年，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单独接见翁森鹤，吹嘘他“是全国工人运动造反最早的头儿”。新生资产阶级王洪文，把翁森鹤作为他的“小兄弟”。一九七三年，王洪文两次找翁谈话说：政治上翻身“要自己去斗争”，“要顶住十二级台风”。选“十大”代表时，王洪文下令：“浙江选工人代表，要把翁选上”。他们不顾本单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党员的反对，硬把翁森鹤充作“十大”代表。翁森鹤伙同“四人帮”在浙江的亲信疯狂反党夺权，王洪文一概予以支持、鼓励。翁森鹤得到“四人帮”的宠信，野心越来越大，他说是“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

为荣。这帮人原来就是地痞流氓，入党做官后，更加恃宠骄横，称王称霸，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徇情枉法，打击报复，无恶不作。他们是黄浦滩上的新权贵。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产资产阶级的典型
代表王洪文》

王洪文及其党羽还经常以办学习班为幌子，对他那帮“小兄弟”进行所谓“造反史传统教育”，灌输“要为司令争气”、“要为在中央工作的上海几位领导争光”等反动思想。王洪文每次窜到上海，都要召见他的“小兄弟”，面授机宜，封官许愿，同时大吃大喝，龙络感情。王洪文的“小兄弟”每出差北京，必去“朝拜”他们的“司令”。逢年过节，王洪文的这帮“小兄弟”总要聚会，在酒足饭饱之余，一个个争先恐后给在北京的王洪文打长途电话，遥祝“司令身体健康”。这伙政治赌徒，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这个发誓：“请司令放心，有我在，我这个系统是忠于司令的”，那个赌咒：“我们不好好干，如何对得起司令！”就是这样一帮牛鬼蛇神，再加上那么几个反动文人和灵魂肮脏、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凑成“四人帮”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把上海作为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疯狂地实行法西斯专政。王洪文猖狂叫嚣：“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一派杀气腾腾的流氓语言。

（同上）

王洪文曾讲：组织大权我是无论如何不放的。他还明目张胆地说：林彪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新干部。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4日《纺织工人愤怒清算大
工贼王洪文的滔天罪行》

“四人帮”结帮是为了篡党夺权。对那些社会渣滓，王洪文叫嚷：“这些人无论如何要保住，关键时刻要依靠他们。”江青也曾得意洋洋地说：“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

《文汇报》1977年3月17日《结帮是为了篡党——
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结行帮搞阴谋的滔天
罪行》

十九、把工会“九大”筹备组变成“四人帮”

同各省联系的联络点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总工会筹备小组是‘四人帮’同各省联系的联络点。”大量事实证明，华主席这个论断是千真万确的。这个联络点的头子就是金祖敏。金祖敏本来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在上海发迹时的“小兄弟”，一九七五年来北京负责总工会筹备组的工作后仍是王洪文的坐上客。他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同筹备组的副组长王景升、张世

忠、蔡树梅、李春明相勾结，把工会“九大”筹备组变成“四人帮”同各省联系的联络点。这个联络点，上通“四人帮”；下连“四人帮”在一些省市的干将、爪牙；横连“四人帮”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门的干将和亲信。他们频繁联络，串通一起，互相支持，推涛作浪，千方百计要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1977年12月24日蒋永清同志在全总机关揭批“四人帮”及其黑干将金祖敏和黑联络点罪行大会上的发言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金祖敏把工会“九大”筹备组作为篡党夺权联络点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金祖敏是工会“九大”筹备组的组长，但他根本不按照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做好筹备工作，却唯“四人帮”之命是从，以工会“九大”筹备组为阵地，插手地方运动，积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他利用筹备组这个合法阵地，先后同“四人帮”在湖南、福建、上海、辽宁、山东、湖北、河南、江西、浙江、广东等省市的干将、黑手、爪牙进行秘密联络，交换反革命情报，收集和转送黑材料，转达“四人帮”的黑旨意，搞了一系列乱党、乱军、乱政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同上)

湖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家乡，是华主席多年工作过的地方，“四人帮”把搞乱湖南作为搞乱全国的一个突破口。去年二、三月间，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叛徒江青却另搞一套，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两次私自召集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一些省市的同志开会，点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的名，大反湘剧《园丁之歌》，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工会“九大”筹备组成员，湖南省总工会主任唐忠富，就是紧跟“四人帮”，大反张平化同志和省委领导，把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的急先锋。他多次派人来京找金祖敏，送黑材料，金祖敏都给予大力支持。金祖敏布置李春明听他们的所谓汇报。他们在汇报中一再强调“张平化后台硬”，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唐忠富亲自带一伙人来京告黑状，金祖敏和张世忠、蔡树梅、王景升、李春明都多次接见、密谈，并且帮助他们同中央办公厅联系，还把中办的保密电话告诉了唐忠富。金祖敏向唐忠富介绍了所谓全国斗争形势，进行路线交底，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并把毛主席病重的绝密消息告诉了唐忠富。当中央办公厅明确表示中央领导同志不能接见时，金祖敏、王景升又帮助唐忠富等一伙人坐全总的汽车两次冲中南海。唐忠富等人在黑联络点的支持下，在京长住达四十五天，干了许多反对湖南省委、干扰党中央的罪恶勾当。

(同上)

福建也是江青点名攻击的重点之一。金祖敏同“四人帮”在福建的黑干将陈佳忠、郑重、庄志鹏有大量的黑联系，从七五年底到七六年九月就达二十多次。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首先发难后，陈佳忠就在福建积极响应，他诬陷廖志高同志紧跟邓小平同志大刮所谓右倾翻案风，陈给金祖敏送黑材料，金祖敏马上转送给王洪文。七六年二月，陈佳忠参加了打招呼会议。为了配合“四人帮”向党进攻，庄志鹏派

张莉文带了一大批黑材料来京找金祖敏，要通过金祖敏转送给陈佳忠。张莉文与金祖敏会见以后，大肆散布江青的黑话说，廖志高是“福建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回去要接受“群众”的批判，也要准备“群众”给代高帽子等等，并立即在全总打长途电话给庄志鹏通风报信，要庄志鹏做好廖志高同志即将从北京回福州的准备。后来廖志高同志回到福州时，在飞机场就遭到早已策划好的围攻。

(同上)

福建还有一个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名叫郑重，他曾经同金祖敏在上海电机厂一起工作过，关系极为密切。郑重调厦门当市委书记后，紧跟“四人帮”，他怀着篡夺福建省委大权的野心，在去年三月、七月、九月三次派他的儿子郑马季来京找金祖敏，要求为他转黑材料，向“四人帮”效忠。金祖敏不仅接见了郑马季，转送了黑材料，而且向王洪文推荐郑重。不久，郑重就调到福建省委工作，成了搞乱福建的重要头目之一。

(同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人帮”在河南省总工会的爪牙吴烈才，搜集了一批攻击纪登奎同志和河南省委的黑材料，来北京找金祖敏。以反映河南省委问题为名，要求金祖敏把黑材料转给“四人帮”。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接见了。后来金祖敏把黑材料也送给了王洪文，给“四人帮”攻击纪登奎同志提供了黑炮弹。

(同上)

这个黑联络点的二老板王景升，是“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亲信，并且深得王洪文的赏识。他来工会“九大”筹备组以前，是抚顺市委书记，抚顺市反党帮派的总头目。他来到北京后，一面与金祖敏沆瀣一气，一面仍与毛远新在辽宁的反党帮派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吴玉德、杨春甫等人保持紧密联络。他既把黑联络点另搞一套的阴谋带回抚顺推行；又把毛远新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在辽宁炮制的所谓“理论讨论会”黑货，拿到全总机关推销。他有时回抚顺去，有时又在京接待抚顺来人，并经常用电话联系，遥控抚顺。据不完全统计，从七六年二月到十二月，王景升从他住处打回沈阳、抚顺的电话就有七十六次之多。抚顺一切重大问题都得向他请示、批准。他在抚顺散布了大量吹捧“四人帮”，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华主席、叶副主席，诬陷邓副主席的大量反革命言论。他指挥抚顺的反党帮派小兄弟另搞一套，层层揪“走资派”，极力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打倒或者挤走。他大搞“双突”，把一批帮兄弟提拔到市委常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部门，借以达到他身在北京，遥控抚顺，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目的。

(同上)

这个黑联络点除了进行秘密联络以外，还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通过报刊发表黑文章，煽动“四人帮”在各地的干将、爪牙向党猖狂进攻。金祖敏按照“四人帮”搞乱全国，搞乱各条战线的反革命部署，同“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合谋，炮制了一篇题为《戳穿邓小平在工运战线的翻案复辟阴谋》的黑文，经过反动文痞姚文元修改审定，以中国

可以先在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左派占优势的工厂单位试验，因为已经联合了，只有一派，条件比较有利，条例不成熟的，不要急于建立。建议全市先组织工人的武卫组织，可否先搞十万人左右？

活动要集中领导，保持有领导的行动。

姚文元1967年8月7日关于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及对联司问题的谈话

中央已经同意了的把工人的武装组织建立起来。我们说，最好上海工人，能够有十万支枪……

张春桥1967年12月5日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则盗用上海工人的名义，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炮制了一份《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张春桥竟敢造谣说，“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改造的问题”，毛主席“批准了”他这个提到“民兵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民兵改造”的问题，根本没有对张春桥的这个报告作过批示。“四人帮”丧心病狂地伪造毛主席的指示，这只能表明他们篡党夺权，蓄谋已久。

《解放日报》1977年3月9日《上海百万民兵斗志昂扬除“四害”》

文攻武卫要搬到厂里去，不要搞大机关。他（指张春桥）有两个负担，一是工总司二是文攻武卫，因为他们名声太大了。

张春桥1968年10月6日的一次讲话

王承龙传达（摘自叶昌明工作手册）

上海工人的武装组织——上海工人民兵，这几年来，在斗争中越来越壮大……上海工人阶级既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也要用枪杆子武装起来，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王洪文1973年4月16日在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团结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工会工作和民兵工作分不开。要把城市民兵搞好，华北、东北、西北都要搞好。

王洪文1973年10月7日的一次谈话

反党分子张春桥公然声称：“今后打起仗来，主要靠民兵”，反动文痞姚文元胡说什么“部队打起仗来，只能起放哨作用，恐怕放哨还放不过来”。

《解放日报》1977年3月9日《上海百万民兵斗志昂扬除“四害”》

人诬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九月六日他们看到毛主席病危的中央电报后，他们又纠合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应当采取什么应急措施，来拥戴“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国人民都在沉痛地哀悼毛主席，而他们这一伙人却喜形于色，多次聚会看电影、聚餐，议论召开三中全会问题，极力吹捧“四人帮”，攻击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叫嚣接班人问题未解决，要研究苏联变修，赫鲁晓夫上台的历史教训，如此等等，简直是头脑发昏，忘乎所以。

(同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逮捕了金祖敏之后，黑联络点的残兵败将丧魂落魄，惊恐万状。但蔡树梅、王景升、李春明一伙还幻想“局势未定”，妄图负隅顽抗，等待时机。此时，这个黑联络点简直象热锅上的蚂蚁，马天水、天秀珍、祝家耀等许多人不断打电话来联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与他们的主子失掉了联系后，惶惶不可终日，于十月八日派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乘飞机来京探听消息，李春明等人向缪文金通风报信，把金祖敏被捕，“四人帮”被粉碎的情况告诉了缪文金，并为他提供各种方便，致使缪文金坐了金祖敏的汽车四出串连。在十月八日晚上缪文金把“四人帮”被粉碎的情报，在公安部用“老娘心肌梗塞”的暗语告诉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上海的余党马上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缪文金还不分昼夜，同“四人帮”安插在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的干将、亲信，研究对策，并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黑联络点覆亡前的猖狂一跳。

(同上)

“四人帮”在工会九大筹备组的黑干将，积极策划，把这个筹备组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联络点，丧心病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肆意攻击、诽谤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四方串连，上下勾结，参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在“四人帮”的策动下，他们在一些省、市工会的党羽，有的围攻殴打省委负责同志；有的要“进驻”党政领导机关，对党委实行“工管”；有的私拟省委领导班子人选，妄图夺省委的权；有的扇动工会干部“眼睛要丁着党委，心要想着党委，手要指着党委”；有的竟然在“四人帮”覆灭前后，阴谋搞反革命武装暴乱，进行垂死挣扎。

《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9日《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工运黑线统治”论》

二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阴谋建立工人“第二武装”，妄图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

春桥同志和我两个人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

分子王洪文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窜来上海，他以“加强战略为名，赤膊上阵，亲自带人去打靶，并且指使他们的余党，私造武器，加紧装备民兵，准备一旦有事，就来个拚死反抗。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8日《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上海市总工会个别头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王洪文讲：“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我们的人”，攻击“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张春桥最担心的就是“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还有一个反动谬论，说“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所以他们就拚命地抓枪杆子，一方面插手军队，分裂军队，千方百计地想把军队搞乱，妄图毁我长城；另一方面把黑手伸进民兵队伍，搞“第二武装”，妄想把民兵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张春桥……，胡说什么“民兵可以管部队”。

《湖南日报》1976年11月11日《忿怒揭发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王洪文说：“工人武装起义，在历史上不少，如二七，……上海等，全国五千多万工人，武装三千万就了不起。”

《辽宁日报》1977年4月12日《煽动工人民兵大批长期脱产的阴谋》

一九七五年秋天“四人帮”多次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后，更加疯狂地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争夺对民兵的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王洪文窜回上海，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私自在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搞区、县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两部合并”的“试点”，限定要在两三个月内拿出“经验”来。他们擅自摘掉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停止武装部的工作，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解放日报》1977年3月9日《上海百万民兵斗志昂扬除“四害”》

新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多次向他们亲信交待：“要尽快把上海武装起来”，“民兵的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分配，抓紧装备”，“一旦有事就好用”。

《解放军报》1977年1月22日《“四人帮”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蓄谋已久》

“洪文说，上海打仗靠正规军不行，要靠民兵。……”

中共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彻底揭发“四人帮”反党集团大字报摘录选编》1977年1月15日

创刊号（按：《学习与批判》）上的另一篇黑文《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则是秉承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王洪文和张春桥搞捏造的“民兵改造”论，鼓吹“民兵独立”、“民兵万能”，煽动“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反军乱军，阴谋拉“第二武装”的，这篇黑文也由姚文元下令转载于中央的一个报纸上。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7日《自掘坟墓自造墓碑——揭批“四人帮”通过帮刊《学习与批判》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工人阶级的败类王洪文先后几次窜来十七厂，强令民兵、治保、消防合并，成立所谓“三位一体”的武保组，搞“民兵至上”。结果，既破坏了民兵的传统和建设，又削弱了消防、治保工作。王洪文还洋洋自得地宣称这是“民兵建设史上的一场革命”，是“一个创举”，狂妄地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解放日报》1977年3月9日《上海百万民兵斗志昂扬除“四害”》

文攻武卫组织问题，包括了主席的新思想，春桥指示，一定要经过考验，斗争中出来的组织，才能武装。

王洪文1967年9月8日的讲话（摘自叶昌明工作手册）

上海武装十到二十万人，国民党来了，我们也不怕了。什么叛乱也不怕。右的想法好不好？有步骤地搞，先训练，会开枪再发一部分枪。把一百万工人思想上武装起来，文攻武卫就有办法了。

张春桥1967年9月8日接见工总司部分委员时的讲话

大工贼王洪文早就别有用心地说过：“总工会不仅要抓文的，还要抓武的。”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8日《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上海总工会个别头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

王洪文一再恬不知耻地狂叫：“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人指挥”；叫嚷什么民兵调动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都要经过他王洪文和张春桥“批准”，并竭力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民兵的创始人”妄图牢牢控制上海民兵。一九七五年秋天，反党

工会“九大”筹备组理论组的名义，登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四人帮”在各地工会中的干将、爪牙，欣喜若狂，闻风而动，马上组织学习座谈。有的写文章响应。有的拿了这篇黑文当做向党进攻的破烂武器，妄想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湖南的唐忠富一伙，在黑文出笼后的第四天，就盗用省、市总工会的名义，召开了所谓“省会工人阶级促张平化同志转弯子大会”，妄图翻案、夺权，矛头指向湖南省委，指向华国锋同志。他们狂叫：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工会是否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中国工会“九大”筹备组理论组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回答。

(同上)

王景升也要抚顺市总工会“好好学习这篇文章”，并造谣说：“这篇文章里除了黑体字以外，还有百分之八十是毛主席的话”。他还下令抚顺市总工会照葫芦画瓢，也炮制了一篇黑文在《抚顺日报》上发表，强调“工会要领导工人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否则，“就是为十七年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翻案，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同上)

这个黑联络点在与各地联络的同时，还与“四人帮”在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的干将、亲信秘密联络，妄图搞乱中央各部，乱中夺权。金祖敏同“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频繁联络，密切配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另搞一套时，金祖敏就亲自去看大字报和“取经”，他在全总机关以清华为样板，另搞一套。金祖敏把黑联络点与各地联络中搞到的黑材料，及时送给迟群，为两校选编黑材料提供炮弹。另一方面，金祖敏又把两校炮制的黑材料大量翻印，在全总机关广为散发，组织批判。这两个黑联络点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一唱一合，互相支持，犯下了大量罪行。

(同上)

金祖敏在“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指使下，还担负了“四人帮”同从上海调到中央各部夺权的党羽进行秘密联络的特殊任务。有个党羽称金祖敏是他们上海驻京的“总领事”，负责管理这些上海派来的“侨民”的。金祖敏对他们布置任务和监督检查，他们经常通过金祖敏同“四人帮”保持联系。金祖敏特别重视联络公安部的祝家耀、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徐海涛、民航局的廖清纯、刘崇福，六机部的张国权等人。他们以总工会招待所、公安部五号楼和徐海涛家为秘密联络点，经常聚会，交换情报，议论分析形势，统一认识，恶毒攻击诬陷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每逢出现重大政治事件，他们都要聚会议论，密谋对策，进行反革命勾当。

(同上)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后，他们聚会议论，为国民党特务张春桥没有当上代总理鸣不平，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按照“四人帮”的部署，策划点名批判邓付主席。中央发出三号文件，他们又聚会攻击华主席、叶付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前后，金祖敏每天都同祝家耀联系，打听消息，还多次同祝家耀、徐海涛等

政治流氓王洪文叫嚣什么：“武器生产问题，要尽快多搞些”，并要三十到四十个工厂搞土生产线，造土枪。……他们又巧立名目，施展诡计，借口超产、增产，利用所谓合法手段留用大量装备，其规模从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逐年留用几千件发展到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的逐年留用几万件武器。

他们还私自生产了各种微型的武器。王洪文不仅搞了特制猎枪，无声冲锋枪等供暗杀使用的武器，而且还偷偷地安排一个工厂试制小型折叠冲锋枪。……为了掩人耳目，他向下布置，“不要说王洪文亲自抓的”，规定“接触的面越小越好”，统一了对外的口径：“枪是做保卫工作用的”。

《解放日报》1977年2月24日《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铁证》

直至“四人帮”复灭以后，他们在市（按：指上海）总工会的那个余党还积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解放日报》1977年3月30日《市总工会机关革命群众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批“四人帮”利用总工会结帮篡党罪行》

“四人帮”一垮台，这帮家伙就一个个跳了出来。有的狂叫要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一死战”。有的气势汹汹地说：“只要电网拉掉，一断电，上海马上瘫痪”。有的胡说什么“索性把上海的水、电都搞掉，一起完蛋算了”。王洪文的得力“小兄弟”还狂叫：“我们一定要干，干也是杀头，不干也是杀头……”。一个余党还公然煽动工人罢工，胡说什么：“宪法上规定工人可以罢工，出了修正主义，就要起来罢工反对嘛。”

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嚷：“要搞我们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是不会束手待毙的”。“大家可以议议采取什么措施，作什么准备。平时说工会要有战斗力，现在看我的工会究竟有没有战斗力，这是对我们的考验”。

《解放日报》1977年3月18日《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桥头堡”》

